

$$P = d.t$$

权力理论纲要

豪尔赫·马赫福德



圣地亚哥·阿卡普尔科

P = d.t. 权力理论纲要

ISBN : 978-1-956760-16-3 (es)

© 豪尔赫·马赫福德 2023-2024. ju.edu

jmajfud@ju.edu

© Illegal Humanus, 2024年5月

humanus.info

editor@humanus.com

对全文的任何商业化利用均保留所有权利。本书的任何部分均可通过任何图形、电子或机械手段进行复制或使用，包括复印或信息检索系统，唯一条件是不得篡改原文。

本书的版税收入将通过联合国认可的国际组织，捐赠给战争中的儿童幸存者

目录

权力史方程式	1
只要权力不被动摇，便宽容以待	3
开放社会中的言论自由	11
奴隶主们对言论自由的担忧	17
异议、多样性与言论自由	21
权力与虚假的异议	35
工人对自由构成威胁	41
工人掠夺了投资者的利益	45
从英雄到反派	49
冷战时期的自由世界	55
作为消费品的公共舆论	59
新闻自由的代价	79
“9·11”事件后	93
自由主义者的“受监视的自由”	97
心理爱国主义	103

问题在于他人的自由	109
以言论自由之名禁止思想	115
迪克西之地	121
不做殖民地的代价	127
历史的终结	131
权力会忘记自己的法律	137
说谎是我们的职业	141
《圣经》式的爱国主义：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布道	147
自由世界中的审查制度	149
若非出于宣传，便是出于法律	155
预言：如果不是法律，那就是枪口	161
开篇随笔	167

权力史的一道方程式

在这篇关于权力历史的简要分析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贯穿不同时期、经济体系和文化的频繁且一致的模式，该模式可归纳为一个简明而简单的方程式，但具有多种推导形式：

$$P = d \cdot t$$

其中P代表霸权力量

（无需是绝对权力，亦可构成独裁权力）；d代表对P的异议、多样性（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以及“言论自由”；而t则表示该权力对d的容忍度。

若解出 t，则得

$$t = P/d$$

由此可推导出：在某个特定的社会体系中，随着异议——多样性——言论自由（d）的增加，宽容度（t）会随之降低，除非权力（P）以同等比例增加。当主导性权力（P）因替代方案或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受到削弱或质疑时，其对各种形式异议的宽容度便会降低。一种没有实际反对力量的霸权力量

会以其更大的宽容度来装点其“罗马和平”，以此向本国和国外确认其合法性。

当然，这种逻辑涉及的是权力平衡。这是一种零和博弈

$$P - d.t = 0$$

基于此，我们可以问：当该方程无法收敛为零时，会发生什么？

答案是直接从该公式推导出的一个推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面临一场革命，其中一种秩序（根据“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是以暴力方式）取代另一种秩序，并在 $P_a = P_c$ 的临界点之后，建立起新的秩序： $P_c > P_a$ ，角色发生转换。因此，根据原始公式，

$$d_c . t_c > d_a . t_a$$

无论是处于衰落中的霸权，还是正在崛起的霸权，都将遵循相同的公式 $P = d.t$ ，但两个冲突体系之间的碰撞无法维持该公式的平衡（例如， $P_a - d.t = 3$ 或 $P_c - d.t = -2$ ）。

宽容，只要权力不被动摇

如果我们根据《圣经》中的记载（无论真实、虚构，还是因反复传述和出于便利而被扭曲）来评判公元第一世纪，总会看到相同的动态。耶稣被犹太统治阶级的政治体制钉上了十字架，而当时执政的帝国对此默许——该帝国允许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前提是这些自由不会动摇其在殖民地中的政治霸权。

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和帝国随后走向衰落，针对这些

（d）异见者的迫害与不宽容日益加剧，直至公元四世纪初达到顶峰。

无论是耶稣还是当时的其他颠覆者（从热诚党到西卡里党或刺客

，这两者因以暴力手段反抗帝国的占领而被视为恐怖分子），都以不同方式挑战了权力金字塔，因此最终的处理方式是简易审判和政治处决，所采用的正是当时处决罪犯的同一方法。

耶稣的“坏榜样”在于他以非暴力方式质疑富人和权贵们的权力以及社会不公，这在所谓的圣经先知传统中极为常见，因此尤为危险。就反殖民抵抗而言，这种行为比武装抵抗更令当权者感到困惑和恐惧。

四世纪前苏格拉底因政治原因被处决一事亦是如此，当时他的异议触动了雅典民主体制中最敏感

的神经。苏格拉底被指控因过多质疑（他所采用的“助产术”）而腐蚀青年，并因对雅典主流神祇抱有过多怀疑而受到指控。

欧洲最不宽容的时期，往往正是当统治权力受到质疑或威胁之时。欧洲向外展现着文明、和平与自由的形象，但其充满偏执且持续不断的暴力历史却恰恰说明了相反的情况。

在中世纪，这种狂热表现为“反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针对当时的政治和思想霸权：穆斯林世界），以及宗教裁判所——

这是对异见和言论自由不容忍的典型例证。

这种意识形态警察（现代警察的起源 以及中情局或国家安全局

等秘密机构的源头）的残暴行径在不同时期有所表现，而无论何时，这都是当权者对新兴舆论威胁所作出的反应。

从12世纪对卡特里派和瓦尔多派的迫害，到所谓“收复失地运动”期间西班牙天主教的不宽容（这与当时霸权势力——即其主要敌人伊斯兰世界——表现出的更大包容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再到16世纪针对新异端——新教徒及其颠覆性宗教改革——的镇压。

现在，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20世纪，聚焦于“自由世界”的另一个中心——也是“开放社会”的媒体典范——我们将观察到不同时期 P $=$ dt 的动态变化。

例如，1924年的反移民法所引发的反应，其针对对象已不再是19世纪那些被认为会“污染”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和权力的中国人，而是南欧的深肤色欧洲人——

他们不仅被视为劣等种族，更是那些带来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思想“污染”的工人。

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些新的不受欢迎者变成了被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驱逐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威胁到了美国大企业家们所推崇的纳粹主义的受欢迎程度。

如果我们暂且搁置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值得另写一章），继续探讨美国的冷战，我们会看到麦卡锡主义现象及其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这是美国自身力量缺乏安全感的直接结果

尽管它凭借二战带来的特权地位，且其前盟友、如今因形势所迫而成为新敌人的苏联——盎格鲁-撒克逊狂热既离不开敌人，有了敌人也无法生存——

在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方面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苏联。

在美国本土之外，在其南方的殖民地，现实情况则更为动荡。言论自由

（只要不涉及实质内容就享有自由，一旦超越界限便受到控制）是成熟帝国的特质。

对“他者”（尤其是思想不同且挑战统治权力的“他者”）的宽容，是那些不会因言论自由或异议而受

到威胁的体制所特有的

，情况恰恰相反：当公众舆论因传统或大规模宣传而固化时，多数人的意见便成为最有效的合法性来源。

正因如此，这些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始终具有帝国性质的体制，不会给予其殖民地与本国公民同等的权利。帝国民主国家

强加的众多“香蕉共和国”式独裁政权

，正是遵循这一逻辑的一个例证。我们将在后文中进一步阐述。

现在让我们来审视（2）法律层面，这是该教条的第二道控制手段，紧随（1）对异见者的骚扰、诋毁和妖魔化之后，紧接在（3）必要时的警察或军事干预之前——无论是军事独裁还是代理人战争的形式，正如最近的三个案例所示

，其中两场目前正在进行，旨在镇压对权力教条的任何质疑：乌克兰 和加沙 ——台湾 或南中国海将是第三场，我们早在近二十年前就曾对此进行过分析，当时全世界正被“伊斯兰威胁”所分散注意力

。当美国尚处于初创阶段、为生存而奋斗时，其政府毫不犹豫地通过了一项法律，以传播虚假思想和信息为借口，禁止对政府进行任何批评——

这距离著名的《第一修正案》

通过仅七年，而该修正案并非源于宗教传统，而是源于欧洲的反宗教启蒙运动。

自然，那部1798年的法律被称为《煽动叛乱法》。一个多世纪后，另一部同样名为《煽动叛乱法》的1918年法案，是在民众对爱德华·伯内斯等人物组织、旨在支持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活动产生抵制后立即通过的——
以此确保收回欧洲债务，并

（据其他理论）作为将巴勒斯坦移交给日益壮大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谈判筹码——

这一叛国行径，竟将原本对犹太传统最为开放的德国，变成了反犹太主义的机器。但这将是另一本书要探讨的问题。

让我们回到美国

。1894年，在全国性罢工被美国军队镇压后，工会活动家尤金·德布斯

因社会活动被判入狱六个月，他在狱中开始研读社会主义理论，并于1901年创立了美国社会主义党，在1912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了6%的选票。

在1920年的大选中，尽管他因1918年被判定犯有“言论罪”而身陷囹圄，仍获得了近百万张选票。德布斯曾反对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根据《煽动叛乱法》

被判处十年监禁，三年后因在狱中患上心血管疾病，获沃伦·G·哈定总统特赦。

以上是事实。按照我们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看到，德布斯获得特赦时，社会主义党已四分五裂，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已以德国

的战败与屈辱告终，巴黎-伦敦-华盛顿轴心得以巩固。

就在几年前，马克·吐温等作家和活动家的严厉反帝国主义批评还曾遭到妖魔化，但当时没有必要通过将一位知名知识分子投入监狱来玷污 *自由社会的声誉*——

就像1846年他们以“拒缴税款”这一完美借口，将大卫·梭罗

投入监狱那样，只因他批评了为扩张奴隶制而对墨西哥发动的侵略和掠夺。

无论是马克·吐温，还是大多数公开批评者，都未能改变任何政策，也未能扭转西方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因为他们的作品仅被经济和金融权力圈之外的少数人阅读。

在这方面，现代宣传手段无可匹敌；因此，对这些批评者的直接审查反而会阻碍他们以自由和民主之名推销侵略行为的努力

。相反，这些批评者反而助长了这种观念——

即现代史上最大、最残暴的帝国

都是引以为豪的民主国家，而非声名狼藉的独裁政权。“自由世界”、“文明世界”……

这些都是意识形态和叙事上的陈腐观念，就像人们常说的“走极端是坏事”一样。这一流行格言在医学领域很容易理解；甚至

过量饮水也是危险的。当谈论政治问题时，这一点似乎也容易理解。人们默认为自己处于中间立场，而任何要求根本性变革的呼吁都被视为极端主义。这

并非新鲜事。

在奴隶制时期，废奴主义者曾被妖魔化为极端分子，被指为文明的终结者，被指要摧毁上帝的神圣秩序，以及社会的自由与繁荣。

如今，若说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群体已经掌控了各国，并正将地球推向灾难，那便是被贴上“极端主义者”的标签。

开放社会中的言论自由

在人类历史的过去四个世纪里，那些最残暴、最种族主义、最压迫性和实施种族灭绝的帝国，恰恰都是民主政体。这些政体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在经济上却是独裁。这些自由主义政权以单一意识形态——资本主义

为框架，并以多种被奉为教条的战略虚构为借口，例如“自由市场”和“人权”。

与此同时，自17世纪初起，诸如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或弗吉尼亚公司等私营巨头，从亚洲到美洲掠夺并屠杀了数百万民众，散播种族主义以及基于种族和世袭的奴隶制；与此同时，它们强加了历史上最恶劣的殖民主义形式，凭借毒品、大炮和保护主义关税摧毁了繁荣的社会；在摧毁市场自由的同时，其宣传机器却大肆兜售关于“自由市场”、“文明扩张”、“促进自由与民主”、“为正义而战”以及“各国人民进步与繁荣”的唯一良方等论调。

事实上还存在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悖论。正是这些残暴的全球性独裁政权，甚至包括像实行奴隶制的美国

这样的国家独裁政权，却（通过法律，且在许多情况下在实际中）允许本国公民乃至外国人的言论自由。

美国种族独裁政权（1776-1868）从一开始就在《第一修正案》中颁布并保护了言论自由和良心自由的权利。

这种自由，正如先前的《我们人民》（1787）一样，并不包括黑人、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尽管“人人生而平等”（1776）。

当南方邦联为摧毁联邦（美国）并以此维护“特殊制度”（即奴隶制

）而发动战争时，它在1861年的宪法中确立了私有财产（尤其是对其他人的所有权）的神圣权利，同时明确规定了“言论自由”的权利，

尽管其范围比联邦的原始版本略为有限：“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不得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并向政府申诉冤情的权利。

鉴于自由国家的安全需要一支受良好管制的民兵，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也就是说，言论自由的前提是不得质疑奴隶制和奴隶主的权力。

事实上还存在一个显著的悖论。那些同样残暴的全球性独裁政权，甚至包括像实行奴隶制的美国这样的国内独裁政权，实际上允许本国公民乃至不少外国人的言论自由。这种针对统治权力的批评性言论自由，从许多角度来看都是无可争议且

不容置疑的。 就连卡尔·马克思

——

这位因普鲁士政权迫害而流亡的人——

也在英国找到了避难所。他在那里虽生活贫困，却写下了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犀利批判；多亏了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将他的文章从德语翻译成英语，这些文章才得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¹

两人在英国靠恩格斯父亲寄来的少量钱财，以及纽约日报每篇稿件支付的10美分维持生计。他们一直受到英国警方的监视，但审查制度并未阻止他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甚至几年后，那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史上首次且最深入批判的著作《资本论》也得以出版。

《资本论》

的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最后一卷于1894年出版。

卡尔·马克思仅亲眼目睹了第一卷的出版。

在《资本论》第三卷

出版八年后，即1902年，英国教授约翰·A·霍布森出版了《帝国主义：一项研究》，他在书中批判了自己所属帝国的残暴行径，并驳斥了“优等种族”的功绩论逻辑：

“大不列颠

已沦为一个靠海外贡赋维生的国家，而享受这些贡赋的社会阶层，越来越有动力利用公共政策、公共财政和公共武力来扩大其私人投资的范围，从而维护并增加其私人投资。”²

霍布森遭到了批评界的排挤，被当时的学术界和主流媒体贬低。

他既未被逮捕，也未被监禁。当他所谴责的帝国仍

在亚洲和非洲屠杀数百万民众时，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王室，都懒得直接对这位经济学家进行审查。

不少人——正如当今所见——

将他视为英国民主美德的典范。

这与当今那些批评美国帝国主义

的人所遭遇的情况颇为相似，尤其是当他们居住在美国

时：“看啊，他批评自己居住的国家；如果他住在

古巴，就不可能批评政府”。

换句话说，如果有人指出多场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反人类罪行，并且是在允许言论自由的

国家这样做的，这反而证明了那个屠杀数百万民众、却容许有人胆敢提及此事的国家，其民主制度的“美德”。

对霍布森而言，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是帝国主义

，即由帝国中心寡头集团主导的金融体系所推动的民族主义事业，该体系不仅剥削殖民地

，还剥削帝国本国的工人。

这一观点（除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原理之外）被列宁在其1916年的分析著作《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重新提出。

西北帝国内部的异议案例

不胜枚举且引人注目。作为资本主义和盎格鲁-撒克逊霸权力量的两大中心，英国、法国和美国，怎么可能在其腹地允许这种激进的言论自由呢？

任何悖论都是具有内在逻辑的表象矛盾。在《蛛网中的苍蝇》（2023）一书中，我们将其概括如下：“一种帝国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无人能抗衡、且无需担心实际丧失特权的权力，并不需要直接的审查。更甚者，接纳边缘性的批评反而会证明其善意。只要批评者不越过真正质疑的界限，这种批评便会被容忍。前提是霸权统治尚未衰落，且未面临被其他力量取代的危险。”

奴隶主们对言论自由感到担忧

詹姆斯·菲尔普斯于1825年1月16日从得克萨斯返回后，从密西西比州给斯蒂芬·奥斯汀写信：“对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富有的种植园主来说，没有什么理由比奴隶制问题更能促使他们投资得克萨斯了。我们从报刊上忧心忡忡地读到，墨西哥共和国已通过一些法律，无一例外地禁止将黑人作为私有财产引入该国，并威胁将对违反这些法律者施以最屈辱的惩罚。我们还获悉，该共和国已决定解放所有目前由得克萨斯殖民者拥有的奴隶，以及任何踏上墨西哥领土的黑人奴隶。”

他还收到了一封由富有的棉花商查尔斯·道格拉斯寄来的信，信中注明于1825年2月15日在阿拉巴马州寄出。道格拉斯对墨西哥政府在废除奴隶制问题上的顽固态度表示担忧

（他断言，这将不利于吸引更富有的棉花商前来），并对墨西哥政府在容忍不同宗教及“良心自由”方面的承诺是否可靠表示怀疑。

四年后，1829年4月25日，道格拉斯从韦拉克鲁斯再次致信，反思白人的自由与黑人的放荡之间的区别，以及蓄奴州的善治与南方国家无政府状态的差异：“我们最宝贵的居民是黑人，

而且，如果事先不能保证其财产权，没有任何一位美国业主愿意迁居墨西哥”。

7月24日，得克萨斯人胡安·塞金——这位后来成为得克萨斯独立战争英雄，却最终被墨西哥人驱逐出自己家园的人——给斯蒂芬·奥斯汀

写信道：“朋友，我理解，如果不允许你的同胞带上他们的奴隶，你就无法说服他们移民到得克萨斯。但这个论点在我们的国民议会中甚至连听都没人听过。”

那个野蛮国家的官员们发现，移民们不仅获得了墨西哥的土地，还强行推行自己的法律。奴隶的数量与日俱增。起初，当局仅限于通报这一事实，并坚持强调：在这片土地上拥有奴隶是违法的。移民们却继续他们的生意，这些警告逐渐变得令人厌烦。6月4日，兰德尔·琼斯（Randall Jones）给奥斯汀写信

，字里行间充满预言色彩：“必须尽快让这片省份人口充实起来，以便在某个时刻，多数人能够强行推行奴隶制”。与此同时，来自北方的移民发来信件，承诺遵守墨西哥的法律，但一旦越过边境，他们便忘却了这些承诺。那个接纳他们并赠予土地的国家法律，既荒谬又不公，且违背自然法则与财产权。

十五年后，即1840年，爱德华·斯蒂夫上校出版了回忆录《德克萨斯移民》（*The Texan Emigrant*），他在书中承认：“我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感到无比自豪，并要求拥有绑架和终身奴役他人的权利，尤其是那些肤色不同的人，以便他们因外貌与我们区分开来并沦为奴隶；我们想要黑人，只有瞎子才看得出来我们根本不在乎如何对待他们；作为好公民，作为那些憎恶黑人存在——就像憎恶天主教神父一样——

之人的后代，我们大胆声明：如果不允许我们将这些非洲之子、该隐的后裔，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奴役，

而且如果我们还被剥夺了依据我们珍贵的良心自由向造物主祈祷的权利，那么我们至少有两个充分的理由来发动叛乱。”

异议、多样性，言论自由

1831年1月1日，美国第一份废奴主义报纸《解放者》（*The Liberator*）在马萨诸塞州创刊，该报后来也成为了女性选举权的倡导者。当时，佐治亚州的奴隶主悬赏5,000美元（按2023年的价值计算超过160,000美元），以捉拿该报创始人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当然，当权者对自由及为他人权利而斗争的反应往往如此，但这种暴力审查的企图在当时并非法律常态。由《第一修正案》确立的言论自由仅适用于白人，且无人愿意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违法。而要纠正这些错误，向来有黑手党、准军事组织，以及后来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秘密机构——若非以其他借口进行法律骚扰的话。

在首篇文章中，加里森便揭示了这场预示着将旷日持久的争论的基调：“我深知许多人反对我措辞的严厉；但这难道没有理由吗？我将像真相一样犀利，像正义一样毫不妥协。关于这一话题，我不想以温和的态度去思考、去谈论，也不愿以温和的笔触去书写。不！试着告诉一个家园正被大火吞噬的人，让他“适度”地拉响警报，让他“适度”地从强奸犯手中救

出妻子，让他“循序渐进”地将儿子从火海中救出...
...”³

《解放者报》行使新闻自由的权利，开始向南方各州寄送报纸。
南方各州政府和奴隶主们的反应并非禁止该报出版——毕竟这违反了法律——

那是一部由某些白人富豪制定的法律，旨在保护他们免受其他白人富豪的威胁；而这些白人富豪从未设想过，这种自由竟会以任何形式威胁到所有白人富豪的政治权力。

与其违反法律，他们转而采用了一种老办法。
既然可以改变规则，何必去打破它们呢？这就是民主的运作方式

。当然，并非所有人过去或现在都有同等的机会来创造这样的民主奇迹。那些无法改变法律的人往往会违反法律，因此被视为罪犯；而那些能够改变法律的人，则最希望法律得到遵守。

除非当自身利益的紧迫性不容许官僚主义的拖延，或者出于某种原因，形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多数派，掌权者便会指责其不负责任、幼稚或危险。

原则上，由于无法直接废除《第一修正案》，因此仅对相关权利进行了限制。

北卡罗来纳州通过了禁止向奴隶传授读写能力的法律

。 ¹

¹ 法律并未明确禁止奴隶

学习读写。法律禁止的是那些懂得读写的人教奴隶读写。同

这些禁令在1830年代持续并蔓延至其他蓄奴州，其理由几乎总是归咎于废奴主义者通过颠覆性文献在黑人中煽动的骚乱、抗议甚至暴力事件。

支持奴隶制的宣传随即展开，各地分发了海报和传单，警告南方正派民众中存在颠覆分子，并警示关于这一禁忌话题的少数几次演讲所带来的危险。

对言论自由的打压

尽管尚未发展到明令禁止的程度——

在北方的大城市

中同样存在。

一份日期为1837年2月27日（即得克萨斯州从墨西哥手中被夺走

以恢复奴隶制一年后）的亲奴隶制传单，呼吁民众聚集在纽约坎农街的一座教堂前，因为当晚七点，一名废奴主义者将在那里发表演讲。

该公告呼吁“让这个魔鬼般的狂热工具闭嘴；捍卫各州的权利和国家的宪法”。⁴

废奴主义者的出版物和演讲并未停止。有一段时间，应对这些活动的手段并非禁止言论自由，而是加大奴隶制宣传力度，并将废奴主义者妖魔化为危险的颠覆分子。后来，当宣传手段不再奏效时，南方各州开始通过法律，限制修正主义思想的

样，如今也没有任何法律禁止任何人接受教育，恰恰相反。但各种政策却使得教育对某些人——

例如无力承担学费的人——

变得遥不可及，与此同时，娱乐和消遣产业却受到鼓励，而这些恰恰与教育背道而驰。

言论自由。

只有当言论自由（即白人异议者的言论自由）失控时，他们才诉诸更激进的法律手段，这次是通过有针对性的禁令或对废奴主义者征税来限制言论自由。例如，1837年，密苏里州禁止了与主流观点相悖的出版物，即反对奴隶制的出版物。

将持不同政见者

投入监狱这种令人不齿的做法极为罕见。当局通常会通过诋毁、审查，或以自卫、捍卫上帝、文明及自由等正当理由为借口，对他们进行私刑处决。

内战爆发后

，实行奴隶制的南方制定了自己的宪法。正如刚从墨西哥分离出来的盎格鲁-撒克逊裔得克萨斯人

所做的那样，出于同样的原因，邦联宪法

既确立了对“特殊制度”（即奴隶制）的保护，同时也包含了一项支持言论自由的条款。

这一条款既未能阻止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出台，也未能阻止奴隶制民兵（南方警察的起源）的准军事组织肆意妄为。

正如1789年《宪法》中的“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以及最初的1791年《第一修正案》一样，这种“言论自由”并不包括那些既不属于“人民”，也不被视为完整且负责任的人。

它指的是自由人。事实上，这个新建立的奴隶制国家的宪法在其第12款中规定，几乎完全照搬了1791年的原始修正案：

“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的自由行使；或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或剥夺人

民和平集会并向政府申诉 冤屈的权利”。⁵

再公正、公平和民主不过了……其中的奥秘在于，与近一个世纪前一样，“人民”一词再次排除了绝大多数人口。如果当时有人指出这一点，他会被指责为疯子、不爱国者或危险的颠覆分子。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讲，这种情况在21世纪并没有太大改变。

2

当1865年，由于一场险些败北的战争所带来的局势，奴隶制被法律废除时，《解放者报》已经出版了1820期。除了支持废奴事业外，该报还支持妇女平等权利运动。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尽管未获法律承认）维多利亚·伍德赫尔

，在1872年大选前几天因发表一篇被定性为淫秽的文章而被捕——

该文表达了违背公序良俗的观点，例如女性有权自主决定自己的性生活。

正如几个世纪以来“自由世界”的惯例，伍德赫尔并非因在自由国家行使言论自由

而被捕，而是以违反其他法律为借口遭到逮捕。

² 这一解释被1861年宪法本身深深铭刻下来——

该宪法在巩固奴隶制权利的同时，还试图根除“获释黑人”这一不良先例，这些人可能从北方被带入南方，其中很大一部分被遣送至海地和非洲，并在那里建立了利比里亚。

第9节规定：“禁止从美国

的奴隶制州或领地以外的任何外国进口非洲裔黑人；国会必须通过法律，切实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然而，这并非奴隶制南方或整个美国所独有的特征。

大英帝国一直采取同样的做法，这与二十五世纪前的“雅典民主制

”并无太大区别：“我们之所以文明，是因为我们宽容不同的观点，并保护多样性和言论自由”。当然，前提是这些观点不能越过某些界限。前提是它们不会对我们无可争议的权力构成真正的威胁。

就此而言，我们仅举一例，以免使本书变得冗长得难以阅读且无法出版。1902年，经济学家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出版了其已成为经典的著作《帝国主义：一项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书中阐明了英国对其殖民地的吸血性质。霍布森遭到了评论界的边缘化，并被当时的学术界和主流媒体贬低。但他并未被逮捕或监禁。当他所谴责的帝国仍在亚洲和非洲屠杀数百万人时，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王室，都懒得直接对这位经济学家进行审查。不少人——正如当今所见——将他视为英国民主美德的典范。这与当今那些批评美国帝国主义的人所遭遇的情况颇为相似，尤其是当他们居住在美国

时：“看啊，他批评自己居住的国家；如果他住在古巴，就不可能批评政府”。换句话说，如果有人指出多场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反

人类罪行，并且是在允许言论自由的国家这样做，这反而成了该国民主优越性的证明——尽管这个国家屠杀了数百万人，却仍容许有人胆敢提及此事。

如何解释所有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并不复杂。

一个霸权主义的、占据主导地位、无人能抗衡、且无需担心实际失去特权的权力，并不需要直接的审查。甚至，容忍边缘性的批评反而能证明其“仁慈”。只要这些批评不越过真正质疑的界限，就会被容忍。只要霸权统治没有衰落，也没有面临被其他力量取代的危险。

现在让我们看看霸权势力
及其走狗的反例。为什么不去 古巴
呢？那里的人民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多党制？

首先，有必要指出，所有政治体制都具有排他性。在古巴，不允许自由派政党参与选举，而这些选举被自由民主国家斥为了一场闹剧。在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例如美国，选举基本上就是由名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党”进行的。第三党根本不可能对“一党”构成实质性挑战，因为该党代表的是企业集团——而这些企业集团正是掌握国家实际权力的精英阶层。

另一方面，例如在智利这样的国家，如果像现任总统加布里埃尔·博里奇

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赢得大选，没有人会想到这位总统会超越宪法框架——

该框架禁止在该国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古巴的情况也是如此，但必须指出，两者并不相同。

现在，让我们回到不同全球权力体系中言论自由
的逻辑。简而言之，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言论自由是一种奢侈品，历史上，那些正在争取从帝国统治下独立的殖民地
或共和国，往往无法享有这种自由。

只需回顾危地马拉民主制度

的例子即可：该民主制度于1954年被美国的“伟大民主”

摧毁，原因在于其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决定执行本国的主权法律，而这些法律不符合跨国巨头联合水果公司

的利益。“伟大民主”毫不犹豫地扶植了另一场独裁统治，导致数十年间数十万人丧生。

20世纪50年代，危地马拉的民主制度

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正是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正因如此，北方帝国和联合水果公司才得以通过一场蓄意策划的宣传运动来操纵该国的公众舆论——

这一宣传运动甚至被其实施者本人所承认，更不用说那些本地走狗了。

当时，这位年轻的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格瓦拉正身处危地马拉，不得不逃往墨西哥流亡，在那里他遇到了其他流亡者——

古巴人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

。当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时，此时已被称为“切”的埃内斯托·格瓦拉，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古巴绝不会成为另一个危地马拉。”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古巴不会像危地马拉那样，被“自由媒体”所同化。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1961年，华盛顿依据中情局的计划入侵古巴，该计划曾断言“古巴将成为另一个危地马拉”，结果却以惨败告终。

为什么？因为古巴民众并未响应这场“解放入侵”，他们并未被“自由媒体”所传播的大规模宣传所洗脑。肯尼迪

深知这一点，并因此指责中情局，中情局曾威胁要解散该机构，最终也被解散了。

言论自由

只适用于那些不会因言论自由而受到威胁的体制，恰恰相反：当公众舆论因传统或大规模宣传而固化时，多数人的意见便是最有效的合法性来源。正因如此，这些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始终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体制，绝不会给予其殖民地

与其本国公民同等的权利。

当美国

尚处于初创阶段、为生存而奋斗时，其政府毫不犹豫地通过了一项法律，以传播虚假思想和信息为借

口，禁止对政府进行任何批评——这距离通过著名的《第一修正案》仅过去七年，而该修正案并非源于宗教传统，而是源于欧洲的反宗教启蒙运动。自然，这项1798年的法律被称为《煽动叛乱法》。

这位“言论自由捍卫者”在历史长河中多次重演此类手段，每当由当权企业集团主导的政府感到其决策和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便会采取此类措施。

1918年另一部同样名为《煽动叛乱法》

的法律便是如此，当时民众对以爱德华·伯内斯为首的宣传家们组织、旨在支持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确保收回欧洲债务——

的宣传活动进行了抵抗。就在几年前，马克·吐温等作家和活动家的严厉反帝国主义批评还曾遭到妖魔化，但当时尚无必要通过将一位知名知识分子投入监狱来玷污自由社会的声誉——

就像1846年他们以“拒缴税款”这一完美借口，将大卫·梭罗

投入监狱那样，只因他批评了美国为扩张奴隶制而对墨西哥发动的侵略和掠夺。

无论是马克·吐温，还是大多数公开批评者，都未能改变任何政策，也未能扭转西方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因为他们的作品仅被经济和金融权力圈之外的少数人阅读。

在这方面，现代宣传手段无可匹敌；因此，对这些批评者的直接审查反而会阻碍当局以自由和民主之

名推销侵略行为的努力

。相反，这些批评者反而助长了这种观念——即现代史上最大、最残暴的帝国都是引以为豪的民主国家，而非声名狼藉的独裁政权。

只有当公众舆论产生过多怀疑时——

例如冷战期间——麦卡锡主义

才应运而生，伴随着直接的迫害，以及后来对民权领袖的（间接）暗杀，还有当针对越南战争的批评威胁要转化为实际的政治变革时，大学里对囚犯和死者的暴力镇压——事实上，

70年代的国会是最进步的，这使得派克-丘奇委员会得以对中情局的暗杀和宣传体制展开调查。

当二十年后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时，公众的批评和示威活动已变得无关紧要且自满自足，但自2001年起帝国主义侵略规模的扩大，使得必须采取新的法律措施，正如1798年那样。

2003年，历史再次重演，只不过这次不再是《煽动叛乱法》（ ），而是《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它不仅建立了直接审查，还建立了一种更恶劣的审查形式：即间接的、往往隐形的自我审查。

更近些时候，当针对种族主义、爱国主义历史叙事以及性少数群体过多权利的批评开始超出可控范围时，人们再次诉诸法律禁令。佛罗里达州最近由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推动的法律便是例证——

这些法律直接禁止修正主义书籍，并对公立中小学及大学的语言使用进行管制——这只是个开始。

人们制造了一个名为“觉醒主义”（WOKE）的恶魔，以取代此前那个名为“穆斯林”的恶魔。

与此同时，那些走狗——尤其是殖民地的走狗

仍在重复几代人前就已形成的陈词滥调：“你明明住在美国 却批评这个国家，你干脆搬去古巴算了，那里才是不尊重言论自由的地方

”。说出这些陈词滥调后，他们自以为如此快乐且爱国，以至于让人不忍心用现实来打扰他们。

2023年5月5日，英国查尔斯三世国王的加冕典礼举行。记者朱利安·阿桑奇——因披露了华盛顿在伊拉克犯下的暴行中的一小部分而被囚禁十余年

给新国王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参观伦敦那座令人沮丧的贝尔马什监狱，那里有数百名囚犯正在痛苦地煎熬，其中一些人是公认的异见人士。阿桑奇被剥夺了自由世界慷慨赋予的言论自由这一神圣权利。他的信件被多家西方媒体刊登，这既证明了西方的仁慈，也暴露了那些从自由世界内部批评自由世界的人所表现出的幼稚矛盾。但阿桑奇依然被当作私刑的典型案例。在奴隶制时期，也有少数黑人曾在公众场合遭到私刑处决。

其初衷是展示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可能面临的后果，而非通过消灭所有奴隶来摧毁这种压迫性秩序。

权力与虚假的异议

任何在社会金字塔顶端僵化的权力，其自然表现之一便是分裂底层民众。资本主义对这一古老法则“分而治之”的变体，在于明确灌输种族主义，以及瓦解、瓦解和瓦解除百万富翁集团以外的任何社会组织，

这些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资本罢工（以他们资本的神圣私有权为名），而每当人民决定采取同样行动——

团结起来捍卫个人权利、阶级利益以及作为被殖民民族的尊严——

时，他们便利用饥饿与贫困向人民施压。

美国学生针对加沙大屠杀发起的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

在很大程度上点燃了其他西方国家起义的导火索——

似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至少，就这一话题向我咨询过的记者们都是这么说的。

如同所有悖论一样，这种逻辑看似自相矛盾：在这个国家，其公民以地缘政治上的无知、对本国帝国主义战争的漠不关心（甚至麻木不仁）以及盲目爱国主义而著称，同时沉迷于消费，并充满军国主义和宗教狂热；

学生抗议却属于一种传统：这一传统始于20世纪60

年代的反战运动，延续至80年代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抗议，随后又发展为针对其强大大学管理层的多项诉求，要求其停止在战争产业、私营监狱以及生态灭绝性污染等领域的投资。

一如既往，当局试图将他们诋毁为不负责任、不切实际的年轻人，然而恰恰是这些年轻人，尽管他们并非来自因基本生活需求而深陷暴力困境的群体，却是社会中信息最通达、最勇敢的一群人。

这其实不难解释：不仅是因为未被商业化的知识，也不仅是因为年轻人较少受腐败影响的理想主义，更因为没有人能想象一个无家可归者工会组织起来，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不是因为他们是生产力，而是仅仅因为他们是人类。

但我认为还有另一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而且这很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正如我开头所指出的，对底层人群的分化一直是上层阶级用来统治的武器。

我本可以列举过去两个世纪中无数关键的例子，但这一规律如此基本，鲜有人会质疑。其表现形式之一——即“瓦解动员”——

过去是、现在仍是一项未成文却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政策：首先，通过瓦解、拆解和妖魔化社会组织（如工人工会）来瓦解动员；

其次，通过教会提供的慰藉——

这些教会几乎无一例外地支持或为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辩护。第三，通过唯一被允许的“神圣世俗化”形式：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教条。

自私与贪婪——

在最初三个世纪处于非法状态的基督教公社信徒眼中，这两者曾是两大原罪；在古代大多数社会哲学中，它们也被视为道德罪过——

到了16世纪，却变成了神圣的美德，以迎合并支撑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

但让我们回到美国学生的具体情况。任何在美国当过学生或教师的人，都清楚校园生活的运作方式。虽然有些人出身于上流社会，无需奖学金或贷款，因为父母会全额支付他们的学费，但绝大多数人还是不得不透支自己的未来来支付世界上最昂贵的学费。还有一些人，由于运气更好或起初表现更出色，获得了奖学金。

无论如何，尽管身处一个充满激烈阶级隔离的国家和全球体系之中——

在那里，特权与阶级斗争同样激烈——

但在校园里，这些差异会逐渐淡化，直至几乎消失。这就是第一点。

第二点，同样与其他社会现实相矛盾，在于大学生之间持续存在的、群体性的、近乎家庭般的社会互动。很大一部分（有时甚至是绝大多数）学生住在校园内的公寓里。那些不住在校园里学生，生活状态也几乎与住在那里无异。例如，在我的课堂上，尽管杰克逊维尔市有100万人口，但来自该校所在城市的学生仅占10%左右。

大多数学生来自遥远的纽约或加利福尼亚等州，以及欧洲、

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等截然不同的各大洲。如果下个学期我没有一门符合这种构成特征的课程，我反而会感到惊讶。这种美妙的多样性（诚然，贫困学生是少数，但因奖学金的存在，他们确实存在）培养了一种人文意识和全球视野，这是社会其他大部分群体所表现出的狭隘偏见中所不具备的，而这种意识在世界其他地方更为人所知——因为荒谬可笑之事往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在网络上疯传。

第三点（就这些思考而言，这是第一点）在于，这种生活方式不仅让年轻人在课堂上接触到不同的思想，还通过与外国同学的相处，让他们接触到不同的生活方式，从体育运动的消遣、公园里的烧烤，到兄弟会和姐妹会中那些极尽夸张的恶作剧——

有天我天刚破晓就赶到办公室，途中发现我常授课的那栋楼入口前的一棵树上，挂着内裤和胸罩。这就是年轻人的事。

作为一名教授，我曾担任过多个委员会的成员，比如学生委员会。尽管我批评美国大学体系不如欧洲或拉丁美洲那样民主——

例如，学生没有投票权——但，他们总能设法组织起来，并为他们认为公正且必要的诉求发声。

也就是说，学生们并没有像将来成为体制齿轮时那样，处于信息匮乏、缺乏行动力、组织松散且心怀恐惧的状态。这使他们对体制构成了威胁，这

也完全解释了为何他们会在全国50所校园中，为一项他们认为公正、必要且紧迫的人权事业发起如此强大的抗议活动。

这些学生除了自身的团结之外别无他力的例子，应当得到应有的重视。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正是政治（经济和媒体）权力集团，这也正是他们不仅放任针对学生的暴力行为，甚至还以非理性的暴力进行镇压的原因——

他们逮捕了3000名学生，却未逮捕任何一名在“蒙面人”事件中率先发动暴力的法西斯分子。

由此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是：社会其他群体亟需重新组织起来，形成各种团体和联盟——不仅包括工人工会，还应涵盖从基层政治委员会到社区委员会等各类联盟。这可以通过那些曾被用来对付他们的分裂和瓦解工具来实现：数字技术。

当个体融入不同的团体、不同的集会——哪怕是虚拟的——

去讨论、倾听、提议，并感受到超越消费主义那贫乏的个体性之外的归属感时，我们将迎来一个新世界。如果人类是自私的，我们同样也不乏利他主义。当我们认清一项正义事业时，我们会超越自身利益为之奋斗。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我们能否再次认识到，人类这一物种的共同利益——至少从长远来看——才是个体的最高利益？恢复这种社区意识和参与感，正是个体与全人类得救的根基。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处于不同层面、拥有不同利益的多元社区，终将使自愿捐赠和税收不再流向那些能够收买总统、参议员、军队乃至全球舆论的超级富豪。因为富人不会捐赠，他们只会投资。当他们不向政客、法官和记者投资时，就会将资金投向道德市场。通常而言——这绝非例外——富人捐赠总是出于个人动机。

人类既受私利驱使，也为集体事业而行动。在政治和理想层面，何为右翼、何为左翼，无需赘言。无论如何，这两种利益都源于人性，都应被纳入那个方程式之中——

正是这个方程式，将使这个焦虑、暴力且永不满足的物种变得更好。为此，大多数人必须摆脱“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阶级地位。

工人对自由构成威胁

在芝加哥，自1886年2月起就拒绝从工资中扣除更多款项用于建造教堂的工人，加倍下注，要求制定一项保护八小时工作制权利的法律。

如同燎原之火，二十万名工人发起大规模罢工，要求实现“三个八”——

即24小时中：八小时用于睡眠，八小时用于工作，八小时用于像人一样生活。

三天后，这场和平抗议以“海市集大屠杀”告终，最终导致那些不站在强权一边的工人被判处死刑。八名工会领袖被指控为无政府主义者，其中五人对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场悲剧只是众多悲剧中的一例，它既是多年劳工抗争的高潮，也是服务于大投资者的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劳工运动的必然结果。

一如既往，几十年后，一位来自上层的权势企业家劫持了底层民众的旧有诉求。亨利·福特在他的“微型共和国”中取缔了所有工会，并自诩发明了“八小时工作制”这一“福利”。

这位种族主义天才——希特勒的崇拜者和同谋——曾算计过：如果全国的工薪阶层没有空闲时间去消费，就没人能买他的产品。

为纪念芝加哥的大屠杀和处决事件，5月1日已成为全球几乎所有地区（除美国

及由此延伸的加拿大外)的法定节假日。对于那些狂热民族主义者——

他们坚信世界统治者拥有神授权利——

而言,“国际”和“工人”这两个词听起来极其危险。

支持奴隶制的南方联盟

最近在政治上的失败,通过一系列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胜利得到了报复。这些胜利都未被人们察觉。

其中之一就是将奴隶主理想化,而将奴隶妖魔化

。正因如此,在未来的许多代人中,美国将*庆祝阵亡将士纪念日*(纪念战争中的阵亡将士)和*退伍军人节*(向那些无休止战争中的退伍军人致敬)。前者是一个抽象的名称;后者则是非常具体的。

对于劳动者而言,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劳动者日”,更不用说“五一国际劳动节”了。为了掩盖这

一尴尬,克利夫兰总统将“*劳动节*”(Labor Day)定在九月,几乎与五月背道而驰,仿佛没有劳动者也能有劳动一般,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内战中战败的奴隶主们取得了一场隐秘的胜利 :

黑人、穷人、底层民众、劳动者,不仅被视为懒汉、低等之人,而且用未来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话说,还是“彻头彻尾的白痴”,更被视为极其危险的存在。尤其是因为他们的数量庞大——

正如人们所说,黑人也是如此。尤其是因为他们有组建工会的习惯。

那些(白人)主人、上层人士、香槟宴会的牺牲品,正是通过投资创造就业机会的人。他们正是那些时不时需要得到教会和军方保护的人(在美国

，通过崇拜“捍卫我们的自由”的战争老兵；在拉丁美洲，则是军方通过血腥的独裁统治或永无止境的威胁（来“纠正”民主的错误）。对于旧时的奴隶制传统而言，对于那些《乱世佳人》中被风吹走却又总会重返的主人来说，进步、稳定、和平与文明的真正缔造者，正是种植园主和工业企业家。他们是“选民”中的精英，代表着那些肮脏且口无遮拦的奴隶（后来是来自贫穷欧洲的白佬；再后来是来自病态且腐败的南方的混血儿）始终想要摧毁的一切。

当然，没有强大的盟友——

比如占主导地位的媒体、顺从的教会——

就不可能拥有绝对的权力。1886年5月17日，与各州许多其他知名报纸一样，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环球民主报》在第五版用七个大版面大篇幅报道了那些不愿每天工作超过八小时的工人的冲突：

“在这场争端中，唯一公正的机构是教会——它由资本家和工人共同支撑，因为它是木匠基督所创立的，因此完全有权代表所有工人发声；教会拥有地球、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因此它也可以代表资本家发声。”

工人正在掠夺投资者

1919年，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发生了一起具有深远意识形态影响的事件，其影响已延续逾百年，尽管其根源可追溯至16世纪的英格兰——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本书中阐述的那样，这是一部无需急于阅读、也不必焦虑的著作——

至少这是所有作家的迷信：他们虚度光阴，研究那些鲜有人关注、且对许多人而言并不合时宜的话题

。

亨利·福特既是主角，也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受害者。作为众多崇拜希特勒并获其授勋的百万富翁之一，他持有贵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社会观。

七年后，他决定赋予工人西方工会长期争取的一项权利——八小时工作制（8-8-

8，即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生活），其依据在于：工人必须拥有时间和消费能力，才能扩大上层人士的商业版图。

与希特勒一样，福特也曾立志生产一款“人民汽车”（*Volkswagen*），

，让一个男人坐在驾驶座上，妻子坐在副驾驶，三个孩子坐在后座。

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由于福特T型车（*Ford T*）的成功——

至今仍行驶在乌拉圭古老的葡萄牙城市科洛尼亚-

德尔-萨克拉门托的街道上——

福特公司积累了过剩的资本，因此其经理亨利·福特决定提高工人的工资。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关策略，更重要的是，福特怀疑某些股东正在积累利润以创立自己的公司并与福特竞争（例如道奇兄弟，他们当时正向福特公司供应机械零部件），但实际上这一举措确实使公司的工人受益。

一得知亨利·福特打算将部分利润分给工人的计划，持有公司10%股份的约翰和霍勒斯·道奇兄弟便起诉了福特公司，他们辩称积累的资本属于股东，而非工人——

工人的工资在市场上已经具有竞争力。

还有什么必要呢？该诉讼的依据是指控工人正在窃取本应属于投资者的钱财。

1919年，密歇根州最高法院裁定道奇兄弟胜诉，这不仅使他们获得了额外资金来创办自己的道奇汽车公司，并生产出数百万辆风靡全球的汽车——这些汽车被视为资本主义效益的明证——

更重要的是，此案确立了一个司法、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先例。

自那时起，其他法院和媒体的裁决将“资本及其收益归属于股东而非工人”这一理念变成了成文教条。

。

该州最高法院明确裁定，公司经理人必须为股东的利益而非为员工的福利来经营公司。这种哲学与半个世纪前被废除的奴隶制体系极为相

似，但在主流文化的其他领域却依然生机勃勃，从媒体大亨威廉·赫斯特到该国最有权势的跨国公司每一位首席执行官，都在复制并践行着这一理念。

毋庸赘言，这些显而易见的论调在“全球南方”的殖民地也被照单全收并加以捍卫——而自那时以来，情况几乎未曾改变。

在霸权中心，意识形态上的异议逐渐减少，直到再无悬念：正是富人创造了工作。正如戴着脚镣的奴隶必须感谢主人每天提供的食物一样，如今，受雇工人也必须感谢那些坐在游艇上、手握威士忌酒杯、决定着数百万人生死的人，感谢他们提供了工作和工资。

谁应该获得经济体系中几乎所有的利益，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正是那些不仅“承担了更多风险”的人

。

从英雄到恶棍

1933年5月26日，备受推崇的斯梅德利·达灵顿·巴特勒将军

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发表了一场关于战争与帝国主义的演讲

。从那天起，他踏上了一条将自己从民族英雄的宝座推向“穷疯子”角落的道路。

这位将军断言，很少有人谈论这些话题时真正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帝国主义及其战争的真正目的在于“以牺牲大众为代价，谋取少数人的利益”。

巴特勒

提议将军事力量限制在边境守卫范围内，这样才能称之为“国防”，随后他继续说道：“问题在于，当美元只能给我们带来6%的收益时，我们会前往其他国家攫取100%的收益。这样一来，国旗追随美元，士兵则追随国旗。我绝不会再为保护银行家的投资而参战.....

我们的战争都是由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精心策划的。我在海军服役了33年，最终晋升为将军，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充当华尔街和大企业的打手.....简而言之，我曾是资本主义的黑手党.....直到退役前，我从未有时间停下来思考。

和所有军人一样，我的思维始终处于停滞状态，只顾着执行命令.....1914年，我致力于确保美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的利益得到保障。在海地和古巴，我也做了同样的事，以便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有一个体面的场所，能够自由地开展业务以谋取利润。为了华尔街的利益，我参与并协助了对中美洲各共和国的侵犯。

从1909年到1912年，我协助“清理”了尼加拉瓜，以便布朗兄弟银行能够继续从该国攫取利益——尽管在抵达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存在。1916年，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也做了同样的事，以维护我们糖业公司的利益。在中国也是如此，目的是让标准石油公司不受任何限制。回首往事，我觉得我甚至可以给阿尔·卡彭上几堂课，唯一的区别是，他只在三个区活动，而我却横跨了三大洲。”

听众们震惊地离开了演讲会场，巴特勒将军觉得有必要再做些解释。1935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战争的勒索》的书，但同样未获评论界好评。与以往的演讲一样，将军将演讲费捐赠给了失业者，这显然强烈表明这位前民族英雄有着自己的思想理念。

同年，在国会一个委员会面前，巴特勒作证称，他曾被一群亿万富翁选中，负责领导一场针对社会主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变。如果他拒绝，第二候选人将是道格拉斯·麦克阿

瑟将军

，第三位是休·塞缪尔·约翰逊将军，第四位是汉森·麦克尼德。

麦克阿瑟作为罗斯福新政策的批评者，反对和平主义并主张增强军事力量，但总统却提议将其预算削减一半。

两人之间的公开争执最终以麦克阿瑟将军离开白宫时当众呕吐这一尴尬场面告终。《时代》周刊将“年度人物”的称号授予了休·约翰逊将军，而非新当选的总统；但次年，罗斯福因其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同情，将其从国家复兴委员会中撤职。至于麦克尼德，他是一位备受认可的将军，但作为政治家却多次在选举中受挫。

根据巴特勒将军的证词，这一阴谋由J.P.摩根等强大金融集团资助，旨在将这位社会主义总统赶出白宫。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也因其政治对手——例如纽约州民主党州长阿尔·史密斯——的指控而被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他针对贫困人群的补贴政策、社会安全制度的建立（该制度在乌拉圭及部分欧洲国家早已存在）、与工会达成的“新政”协议，以及通过公共工程依靠国家力量振兴经济的举措，都招致了保守派和资本家的憎恨。安德鲁·杰克逊 和詹姆斯·波尔克 曾所属的政党——即南方亲奴隶制保守派政党——与北方的自由派共和党人结成了联盟。自此，民主

党成为美国左翼政党，主要得到工业化北方居民的支持；而林肯领导的共和党则成为南方各州的保守派代表。

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

，在过去二十年间参与了美国在中美洲、加勒比地区、亚洲和欧洲几乎所有参战的战争后，已成为一位民族英雄，也是当时获得勋章最多的军人。他于1931年退役，一年后作为参议员候选人参选，但以较大差距落选。

当时，巴特勒因其令人不安的言论以及通过多次演讲筹集巨额善款捐赠给失业者的行为，已遭到部分媒体的抵制。媒体嘲笑他关于华盛顿发生所谓政变的指控，更乐于反复报道他对贝尼托·墨索里尼

以及“美国萌芽中的法西斯主义”的批评。

其中还包括他对罗斯福总统的批评——

巴特勒曾指责罗斯福向超级富豪精英阶层的压力低头。《外交服务》杂志刊登了他的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例如：“必须揪住华尔街的脖子，狠狠地摇一摇。”

经过两个月的调查，由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约翰·W·麦考马克和纽约州众议员塞缪尔·迪克斯坦领导的众议院委员会以“令人震惊的清晰度”证实了该阴谋的存在。

然而，耀眼的光芒往往令人目眩。尽管从未提供过任何证据，该委员会仍被指控接受苏联资助，并于1938年蜕变为截然不同的机构：反美活动委员会，负责追查一切涉嫌共产主义的人士。由于当时纳粹党极具人气，因此被排除在所有怀疑之外。

1934年11月22日，《纽约时报》第20版将这位荣膺勋章的将军的指控以及众议院委员会的结论称为“大规模的虚构”。
此事就此了结。

冷战时期的自由世界

只有当公众舆论产生过多疑虑时——例如冷战期间——麦卡锡主义 才会在霸权力量 (P) 的核心地带应运而生。苏联不仅几乎凭一己之力击败了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纳粹德国，而且始终展现着一种另类的经济和社会成功范例，尽管其中存在备受质疑的古拉格劳改营和斯大林式的审查制度。正是这一替代方案，在短短四十年间，将一个贫穷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强国，并使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了数年——

这与共产主义中国（毛泽东的对手）在1958-1962年大饥荒灾难之后所取得的成就相似，而随着80年代起的新一轮改革，其成就表现得更为惊人。自80年代起，通过新一轮改革，其成就更为惊人。更糟糕的是，在50年代末，苏联赢得了太空竞赛，成功将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只动物（母狗“莱卡”）以及第一名人类送入轨道。

无论是直接迫害民权领袖，还是后来对民权领袖的（间接）暗杀，还是当针对越南战争的批评几乎要演变为实际的政治变革时，大学里发生的导致囚犯和死亡的暴力镇压——事实上，70年代的国会是最进步的，这使得派克-

丘奇委员会得以对中情局的暗杀和宣传制度展开调查。

当二十年后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时，公众的批评和示威活动已变得无关紧要且自满自足，但2001年起帝国主义侵略规模的扩大，迫使政府必须采取新的法律措施，正如1798年那样。

现在，让我们回到不同全球权力体系中言论自由的逻辑

。简而言之，我认为有必要认识到：言论自由是一种奢侈品，历史上，那些正在争取从帝国统治下独立的殖民地或共和国，往往无法享有这种自由。只需回顾危地马拉民主制度

的例子即可：该国于1954年被“伟大的民主国家”美国

摧毁，原因在于其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决定执行本国的主权法律，而这些法律不符合跨国巨头联合水果公司

的利益。“伟大的民主国家”毫不犹豫地扶植了另一场独裁统治，该独裁统治

在数十年间造成数十万人丧生。

伊朗、智利、刚果、印度尼西亚、布基纳法索……

同样的情况比比皆是。这还仅限于冷战时期。

20世纪50年代，危地马拉的民主

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正是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正因如此，北方帝国和联合水果公司（UFCo）才得以通过一场蓄意策划的宣传运动来操纵该国的

公众舆论——

这一宣传运动甚至被其实施者本人所承认，更不用说那些本地走狗了。

当时，这位年轻的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格瓦拉正身处危地马拉，不得不逃往墨西哥流亡，在那里他遇到了其他流亡者——

古巴人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

。当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时，此时已被称为“切”的埃内斯托·格瓦拉，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古巴绝不会成为另一个危地马拉。”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古巴不会像危地马拉那样，被“自由媒体”所同化。历史证明他是对的：1961年，华盛顿根据中情局

的计划入侵古巴，该计划曾断言“古巴将成为另一个危地马拉”，结果却以惨败告终。

为什么？因为古巴民众并未响应这场“解放入侵”，毕竟“自由媒体”所传播的大规模宣传未能对他们产生影响。

肯尼迪

深知这一点，并因此指责中情局，中情局曾威胁要解散该机构，最终也被解散了。

作为消费品的公众舆论

1953年8月15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PBSuccess行动”的授权令，中情局借此以捏造“共产主义威胁”为由，决定推翻危地马拉总统 雅各布·阿尔本斯 。 用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小克ERM特·罗斯福的话来说——他一年前曾成功参与推翻另一位民选总统穆罕默德·摩萨台——“危地马拉将成为另一个伊朗”。在危地马拉，61名当选国会议员中只有4人是共产党员，而且他们对军队的影响力——就像拉丁美洲任何其他军队一样——为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共产党员建议总统采取资本主义改革方案，即被征用的土地不应归政府所有，而应转交给危地马拉农民的私人手中。

1953年12月3日，中情局批准了300万美元的行动预算，随后又追加了400万美元，并增加了50万美元。³ 为此，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任命约翰·佩里福伊担任驻危地马拉大使。佩里福伊曾是西点军校的落

³ 总计7500万美元（按2024年价值计算）。

榜生，梦想成为美国总统，并为此通过一位熟识国会议员的特别关照，在国会大厦谋得了一份电梯操作员的工作。杜勒斯嗅到这位前电梯操作员具备他所需要的东西：一种关于“红色威胁”的可靠偏执。

12月，新任大使普里福伊（Peurifoy）刚到任不久，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馆副馆长、幸存外交官威廉·L·克里格（William L. Krieg）便完成了他的报告，并断言反动势力和寡头集团是“头号流浪汉.....

只想着钱的寄生虫”，而共产党人“勤奋工作、富有思想，并且清楚自己工作的目的”，此外还“诚实且充满奉献精神”。比尔·克里格补充道，悲剧在于“唯一致力于辛勤工作的人，恰恰是那些从定义上来说就是我们的敌人”。

命运的安排下，几乎所有参与策划针对阿尔本斯政变的人士都是联合水果公司的投资者：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负责美洲事务的国务卿助理、前联合水果公司总裁的兄弟约翰·穆尔斯·卡博特；参议员兼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博特·洛奇；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秘书，安·惠特曼，即中情局新闻主任埃德蒙·惠特曼的妻子；国务次卿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他将加入联合水果公司的董事会。

其中的经济原因既深远又广泛，但很容易理解。1936年，现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作为沙利文与克罗姆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曾在华尔街为联合水果公司在危地马拉建立香蕉垄断地位，这一切都得到了当时独裁者豪尔赫·乌比科将军⁴的宝贵协助与支持。自那时起，约翰还曾担任中美洲铁路公司（Railways of Central America）和电力债券与股份公司（Electric Bond & Share）的代表。如今，他与身为中情局局长的兄弟艾伦·杜勒斯联手，动用世界头号强国强大的国家机器，阻止世界某处偏远地区的穷人获得自己国家的一小块土地来生产基本食物，从而威胁到北方成功者的权威。1944年，当哲学教授胡安·何塞·阿雷瓦洛及其受富兰克林·罗斯福启发的“精神社会主义”赢得该国首次自由选举时，UFCo在危地马拉的盛宴便已落幕。随着这一鲜为

4

自上个世纪以来，美国公司就一直主导着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20世纪中叶，库亚梅尔水果公司（Cuyamel Fruit Company）的创始人塞缪尔·泽穆雷（Samuel Zemurray）——他策划了1911年的洪都拉斯政变（），后来担任UFCo的董事——曾坦言：“在洪都拉斯，一名立法者的价值还不如一头骡子。”

人知的民主政体的建立，一个罕见的改革时期拉开了序幕，这些改革限制了土地赠予和税收减免——这些特权曾在豪尔赫·乌比科独裁统治期间使“章鱼”集团受益匪浅。 雇佣宣传家爱德华·伯内斯（

）沿用其经典手法——

让他人说出他希望民众重复的话，正如他此前曾将香烟塞进歌剧女高音口中那样——

如今他将香蕉塞进好莱坞明星（

）手中，由此开始为“章鱼”粉饰形象。一如既往，伯内斯的宣传运动大获成功。

这不仅仅是为了通过补贴和饥饿工资来降低生产成本。商业意识形态需要有其服务的心理学和伦理学。工人对UFCo等公司的近乎绝对的依赖，使穷人无法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从而无法摆脱受雇工人的身份，也无法摆脱绝望消费者的身份。

早在拉丁美洲发生大屠杀之前，UFCo就意识到必须在其南方的雇员心中植入对物质财富的渴望。这绝非什么新想法。一个世纪前，为了在其加勒比海领地颁布废除传统

奴隶制的法令，英国人曾设计出一种连新奴隶都心甘情愿接受的奴隶制。

1833年6月10日，议员里格比·沃森曾对此作了非常明确的阐述：“为了让他们工作并培养他们对奢侈与舒适的喜好，首先必须循序渐进地教导他们，去渴望那些通过劳动可以获得的物品。

从拥有必需品到渴望奢侈品，这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一旦获得了这些奢侈品，它们就会在所有社会阶

层中成为必需品。这就是黑人必须经历的进步，这也是他们必须接受的教育。”

UFCo

记下了这一点并付诸实践。1929年，该公司最受推崇的记者（也是亨利·福特的友人）、塞缪尔·克劳瑟报道称，在中美洲，“人们只有在被强迫时才会工作。他们不习惯工作，因为土地能提供他们所需的微薄生计……但对物质的渴望是需要培养的……我们的广告与在美国产生的效果相同，并且正在影响普通民众，因为当这里有人丢弃杂志时，人们会捡起来，而其中的广告页便作为装饰贴在草屋的墙上。我曾见过小屋内部完全被美国杂志的页面覆盖……这一切都在起作用，正在唤醒人们的消费欲望。”塞缪尔·克劳瑟将加勒比地区视为美利坚帝国的内湖，它保护并引导着这些国家的命运，以实现所有人的荣耀与发展。

但发展并未到来，情况恰恰相反。对物质消费的渴望，也远不及那股席卷拉丁美洲、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来得强烈——

而这种渴望到目前为止，已经推翻了多个独裁政权。随着雅各布·阿尔本斯（ ）的当选——

他虽出身上层阶级，却有着某些人那种对底层民众的轻视——阿雷瓦洛教授（ ）的改革得以延续，但并未走向激进。在其执政期间，数百个贫农委员会应运而生，负责商讨和管理

新分配的土地，这在当时被视为共产主义或某种同样危险事物的明确征兆。当阿尔本斯就任总统时，70%的人口是文盲，而在土著人口中这一比例高达90%，也就是说，超过60%的危地马拉人被迫从事强迫劳动，按照传统他们根本得不到报酬，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8岁。

在UFCo公司和本土寡头集团的掌控下，2%的人口拥有72%的土地，而该国经济几乎完全依赖农业。

1944年至1954年民主时期引发的紧张局势和利益冲突导致两名大地主丧生，但这未能阻止该国的民主化进程。1950年，阿尔本斯

启动了一项土地改革计划，该计划涉及1.3%的可用农业用地。

该改革包括征用UFCo公司手中一小部分低产土地，这些土地是该公司从阿雷瓦洛之前的独裁政权那里获得的。⁵ “章鱼”拒绝接受他自己在纳税申报中申报的价值（每英亩2.98美元），并索要每英亩75美元的补偿。

随着这位民主总统被推翻，卡斯蒂略·阿马斯将军——众多傀儡之一（这类人从来不难找到）——

⁵ 政府曾提议将独裁者豪尔赫·乌比科（Jorge Ubico）赠予UFCo的95,000公顷土地进行国有化，这一面积仅为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70年代在奇瓦瓦州拥有的牧场面积的两倍，而乌比科的赠予行为违反了墨西哥法律和宪法。

上台后，爱德华·伯内斯、中情局以及艾森豪威尔政府

将继续努力为这位神经质的独裁小人物洗白形象。在政变成功之前，这位留着希特勒式小胡子的将军早已为华盛顿所熟知。

1946年，他曾在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完成一门培训课程；1950年，他针对阿雷瓦洛

的政变企图以失败告终。1953年，中情局在洪都拉斯找到了他，并将其带到佛罗里达州奥帕洛卡参加了一次培训。

此后，中情局每月向他支付3,000美元（按2020年价值计算相当于29,000美元），外加供其140名手下使用的补给。卡斯蒂略·阿马斯及其手下参与的每次行动均以失败告终，并造成多人死亡。中情局对此从未在意，因为该组织并非真正的作战单位；它仅仅是用来转移媒体注意力的第二个主要借口。

此时，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将邀请他前往华盛顿，在电视上谈论阿尔本斯领导的共产主义政府——

该政府被危地马拉人民推翻，因为人民从未接受过谎言和外国干涉（背景布景将展示一柄圣乔治之矛般的十字架，矗立在镰刀和锤子之上）。

这位神色紧张的将军对尼克松说：“您告诉我该做什么，我马上就做。”在随后的数年乃至数十年里，危地马拉接连不断的独裁政权将无法掩盖因华盛顿那些“救世主式”计划而持续发

生的数十万人大屠杀。

仅其中一位独裁者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就在1982年下令屠杀了18,000名土著居民。不久之后，罗纳德·里根总统

在访问这个“热带地狱”时，竟将这位实施种族灭绝的独裁者赞誉为危地马拉争取自由、对抗邻国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的典范。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教会，例如“700俱乐部”

，也一直支持这位福音派兄弟，直至他2018年去世。

尽管展开了残酷的镇压行动，中情局

仍承认，无论是在危地马拉

还是在拉丁美洲，共产党都只是一股微不足道的力量。在中情局以及包括阿根廷在内的部分拉丁美洲军队，在贸然发起

通过更多政变来“拯救”本国的冒险行动之前，都做出了同样的判断。

1954年，在危地马拉61名议员中，只有4人是共产党员。不过在工人工会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确实发挥着一定作用。正如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一样，核心问题并非共产主义，而是那种被方便地贴上“共产主义”标签的反抗行为。

在阿尔本斯当选总统之前，美国大使馆

曾向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总统

发送了一份名单，列出了应从其政府中撤换的人员，但这位总统却以不同寻常的态度无视了这一要求。以某个“香蕉国会”通过的法律为借口，威胁一家

美国企业的利益，则是另一种明显的抗命表现。中央情报局历史部的同一位研究员尼古拉斯·库拉瑟教授，在数十年后得出结论：联合水果公司惯常将利润和资产价值报得远低于实际数额以逃避纳税，但爱德华·伯奈斯却说服了美国国会和公众相信相反的说法：“这与香蕉无关，而是关乎共产主义”。从一开始，这一论调就极具说服力。“凡是看到有人谈论或批评联合水果公司的地方，就应将公司名称替换为国家名称——美利坚合众国”。一些报道将雅各布·阿尔本斯描述为一名保守派政治家。驻危地马拉的美军同样未察觉任何“共产主义威胁”，但正如110年前入侵墨西哥时那样，他们以效率、职责和荣誉之名，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直到数十年后，部分人的良知才开始不安，并开始坦率表达自己的想法。

此时，爱德华·伯奈斯正担任涉事企业（联合水果公司）的顾问，他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宣传家，也是现代公共关系的创始人。他亲自挑选了《泰晤士报》、《新闻周刊》、《纽约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中他认为最不了解内情的记者，并由联合水果公司全额资助，派他们前往危地马拉，以“报道中美洲的共产主义活动”。在前往危地马拉的旅途中，伴随着古巴雪茄和大量

威士忌

，组织者们负责在记者们心中确立这一教条：所有人都要去报道一个已被马克思主义独裁政权接管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俄罗斯人则更喜欢伏特加。在被灌输完这些观念后，当抵达该国时，记者们的视角便顺应了这一教条，而非现实，并迅速转化为美国媒体的头条新闻以及“自由国家”的公众舆论。

唯一敢于提及雅各布·阿尔本斯总统合理的土地改革

以及民众对美国跨国公司不满的记者，是《纽约时报》的悉尼·格鲁森。不久之后，《纽约时报》的商业总监将迎来他的朋友——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

的来访，而悉尼·格鲁森也将被撤出中美洲报道领域。

虽然从未踏足过危地马拉，但伯内斯却对整件事了如指掌。

这就是他的行当：不仅要洞悉他人所不知之事，更要让人们相信客户希望他们相信的内容。伯内斯是一位老练的雇佣军，其能力之强，以至于他的年薪（十万美元，还不包括额外收入）甚至超过了任何一位美国总统

。作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侄子，他感兴趣的并非研究他人的心理，而是通过操纵心理所获得的金钱。

1924年，他说服了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在连任竞选期间为支持者煎制煎饼，这一民粹主义

传统作为一种教条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1927年，他通过“自由火炬”宣传活动，成功地让女性开始吸烟，从而增加了“幸运牌”香烟的利润。

就连毫无防备的女权主义者也落入了他的陷阱。伟大的伯内斯（

）还促成了美国人早餐吃鸡蛋配培根的习惯，他以此来增加其客户——纽约比奇-

纳特包装公司（Beech-Nut Packing Company）的培根销量。他也是推销战争和政变的幕后策划者之一，例如在危地马拉发生的这场政变。

不仅阿道夫·希特勒

曾满怀钦佩地阅读过美国人麦迪逊·格兰特

所著的《*优等种族的没落*》（*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一书——

他还曾致信格兰特，感谢对方为他提供了这本“政治圣经”——而且他未来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也将爱德华·伯奈斯的著作放在了图书馆触手可及的地方（是的，戈培尔也有犹太朋友）。

20世纪40年代，伯内斯曾受雇于联合水果公司——这家因其触角四处延伸而被称为“章鱼”的跨国公司，自19世纪起便统治着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其预算规模甚至超过了任何一个它能自由经营的“香蕉共和国”。

如今，策略已然明朗：必须再次挥舞共产主义的幽灵。手段不缺，且不遗弃任何一种。当资金充裕时，成为天才再容易不过。

中情局（CIA）的强力特工霍华德·亨特（ Howard Hunt Jr.）拜访了美国天主教主教们（ ），并说服他们相信来自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威胁（ ），因此主教们毫不迟疑地谴责了阿尔本斯总统（ ）的共产主义政策。

1954年4月9日，一封牧函送达马里亚诺·罗塞尔·阿雷利亚诺大主教手中，随后又有几封措辞更为严谨的信件送达危地马拉各主教处

，警告那些“敌视上帝 和祖国”的危险势力。罗塞尔·阿雷利亚诺在摧毁本国的民主和法治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如常例所示，于1964年去世后卸任大主教职务。1954年4月4日，就在政变发生前不久，他下令雕刻了一尊木制耶稣像，随后该像被铸成青铜像，并被命名为“埃斯基普拉斯基督像”。就这样，耶稣——这位生前既憎恶武器，又关爱穷人和边缘群体的人——

被当作“总司令”，被用于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法西斯势力，对抗阿尔本斯政府并支持美国帝国主义，却完全无视这样一个事实：耶稣当年正是被当时当权的帝国当作普通罪犯处决的，当时还有另外两人与他一同遇害，且处决理由是政治性的，而非宗教性的。

大主教的声明写道：“我们发出呼吁，提醒天主教徒注意：有史以来最恶劣的无神论学说（反基督教的共产主义）正在我国继续肆无忌惮地蔓延，它伪

装成针对最贫困阶层的社会改革运动.....

每位天主教徒都应

仅凭其天主教徒的身份就与共产主义作斗争.....他们是无国之人，是人间的渣滓，他们以宣扬阶级仇恨来回报危地马拉的慷慨款待，其目的就是为了洗劫并彻底摧毁我们的国家。”这些论点在西班牙语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天主教的狂热与它的老对手——新教的狂热——极为相似。

虽然势力较弱，但危地马拉的主要工会仍然支持总统。尽管阿尔本斯并非共产主义者，尽管像拉丁美洲任何国家一样，共产主义者只是极少数，但要让美国人和危地马拉的人民相信他确实是共产主义者，却丝毫不成问题。⁶

其他民族有权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任何样子，甚至包括共产主义者，这一点甚至根本没有被提上议程。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广播电台和主要报纸开始刊载华盛顿编造的故事：“我们确信危地马拉与莫斯科之间存在联系”。这已经绰绰有余。毕竟，一个拥有中情局

⁶ 与当时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一样，苏联没有设立大使馆，与美国无处不在的存在（无论合法还是非法，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相比，其存在微不足道且无关紧要。

正如刚果的帕特里斯·卢蒙巴以及其他被欧美外交政策逼入绝境的第三世界领导人一样，阿尔本斯直到为时已晚时，才寻求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

这样超机密机构的国家，总是比其他凡人知道得更多，并且保留着“出于安全原因”提供证据的权利。

在美洲国家组织（OEA），危地马拉代表吉列尔莫·托里埃洛·加里多对该组织关于“若发现共产主义影响，其他国家有权进行干预”的决议提出抗议。该决议是应中央情报局（CIA）局长艾伦·杜勒斯的要求提出的，而杜勒斯在同一场加拉加斯会议上，竟将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

领导的委内瑞拉独裁政权称为“典范”。在国际舆论喧嚣之中，托里埃洛却能清晰地看到数百万民众无法也永远无法看清的事实：“任何民族主义或独立运动都被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任何反帝国主义或反垄断行动亦是如此，这实在令人痛心.....而最关键的是，那些如此诋毁民主的人，其目的正是为了摧毁民主本身。”

墨西哥、阿根廷和乌拉圭是唯一支持托里埃洛观点、批评一切形式的干涉主义并反对《加拉加斯宣言》的国家。但它们在表决中投了弃权票，危地马拉则孤立无援。

由华盛顿推动的第93号决议措辞强硬，旨在“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美洲各国]的政治独立，抵御代表外国专制主义利益的国际共产主义的干涉，并重申美洲人民对有效行使代议制民主的信念”。

被称为“现实主义”或“现实政治”的权力政治文献，蕴含着无限的爱国想象力。

与此同时，在佛罗里达州奥帕洛卡（Opa-Locka），“解放电台”的虚构宣传活动仍在继续为最后阶段做舆论铺垫，同时假装是一家从危地马拉丛林中播出的反抗电台。

作为补充，并且这将成为该大陆的一项悠久传统，中情局

和美国国际宣传署（USIA）凭借美元的力量，在拉丁美洲各家报纸上刊登了至少200篇文章，谴责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威胁。⁷

这只是计划的一部分。尽管美国官员认为阿尔本斯的政策

是“民主且保守的”，但危地马拉甚至无法获得世界银行的贷款来实施其土地改革。

一些危地马拉大地主怒不可遏，向尼加拉瓜独裁者阿纳斯塔西奥·索摩萨

求助。后者在去年4月访问白宫会见杜鲁门总统时，曾用流利的英语告诉他：“只要给我武器，我就能一笔勾销，替你们清理危地马拉。”

自阿尔本斯

在1950年大选中获胜以来，华盛顿一直拒绝向新政府出售武器。这是一个巨大的牺牲，但为了正义事

⁷ 在拉丁美洲主流媒体上刊登评论文章并非中情局唯一惯用的手段。数十年后被调查人员揭露的另一项惯例，包括向友方或敌对团体暗中输送武器，以便让毫无防备的当地媒体发现。

业。1953年，美国曾阻止从加拿大 和德国购买国防物资，但现在却将最先进的武器提供给流亡在洪都拉斯 和尼加拉瓜 的危地马拉流亡者。

2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与联邦调查局（FBI）

合作，实施了“洗衣盆行动”（Operation Wash tub），将苏联武器埋藏在尼加拉瓜海岸，以便被渔民发现，从而让索摩萨独裁政权能够指控危地马拉 在该地区策划共产主义阴谋。

别无选择之下，阿尔本斯总统

（正如七年後刚果的帕特里斯·卢蒙巴所做的那样）只能向捷克斯洛伐克求助。1954年5月5日，斯堪的纳维亚船只“阿尔夫赫姆号”（MS Alfhem）抵达巴里奥斯港

，船上载有后来被证明已过时的武器，这为华盛顿的干预提供了新的借口。

6月，中情局用凝固汽油弹轰炸了停泊在圣何塞港的英国船只“斯普林菲约德号”，结果发现该船实际上载有美国格雷斯航运公司的棉花和咖啡，这也成为中情局因失误而遭到起诉的少数案例之一。

1954年5月27日，盟友独裁者阿纳斯塔西奥·索摩萨向媒体通报称，除查获的武器外，还掌握了运送这些武器、目的地为危地马拉的苏联潜艇的照片。

1987年，参与该行动的中校约翰·R·斯托克韦尔（中情局官员）承认：“由美国支持的政府屠杀8.5万名危地马拉

人

并未给美国赢得新的朋友，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最终，UFCo公司破产，其总裁自杀身亡。”

另一名中情局特工、危地马拉行动的活跃成员——海军上校菲利普·克莱·罗廷格——负责在洪都拉斯训练士兵，并扶植卡斯蒂略·阿马斯将军——“那个神经质的矮个子”——登上总统宝座。

1986年，罗廷格承认：“政府中没有人认为危地马拉会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危地马拉政府可能构成的唯一威胁，是对联合水果公司利益的威胁；这就是唯一的原因。”政变发生数年后，罗廷格放弃了一切，搬到了墨西哥的瓜纳华托。⁸

对于新上台的独裁者卡斯蒂略·阿马斯将军来说，事态发展也并不顺利。在1957年遇刺身亡之

⁸ 根据中情局档案记载，在2011年一份1986年3月16日文章的“经过审查的副本”中，罗廷格上校写道，阿尔本斯更像资本主义者而非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位试图将依附型资本主义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也就是说，过于独立了。在《对中情局人来说，仿佛又回到了1954年》一文中，罗廷格感叹道：“我们的成功导致了长达31年的军事独裁统治和10万人遇害，此外还摧毁了该国亟需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如今，罗纳德里根总统向我们传达的，正是时任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年在佛罗里达州对我们所说的那番话——我们的斗争是反对共产主义……”

前，这位留着希特勒式小胡子的将军曾因“为民主而斗争”而获哥伦比亚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这也正是罗穆洛·加列戈将该校授予他的学位退还的原因）。

卡斯蒂略·阿尔马斯将访问华盛顿，并与副总理查德·尼克松

共同参加一档电视节目。在镰刀和锤子被十字架那无情的长矛刺穿的布景前，尼克松

说道：“危地马拉

的这场起义是人民针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反抗……换句话说，雅各布·阿尔本斯

的政权并非危地马拉的政府，而是受外国势力控制的政权。”

作为危地马拉最高独裁者的卡斯蒂略·阿尔马斯将军，对一切都只回答“是，是”。他既不懂英语，也不懂其他任何事情。

他只知道，自己的镇压力量来自豪尔赫·乌比科政权的成员（乌比科是一个毫不掩饰的纳粹分子

，身处一个印第安人占多数的国家

），他的政权曾以“颠覆国家”为由禁止俄罗斯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且就在几年前，有人告诉他，也许美国

能在他在大选中输给那个该死的雅各布·阿尔本斯之后，帮助他当上总统。

1996年12月29日，联合国将促成危地马拉和平协议的签署

。到那时，2%的人口将拥有危地马拉一半的可耕地。在接连不断的军事独裁统治下，将有20万人遇害，其中93%是被“祖国士兵”处决或屠杀的。

1999年，比尔·克林顿总统

将访问该国，并承认美国在1954年摧毁该国民主以及随后对实施种族灭绝的军方提供援助方面的责任

。“美国对危地马拉军队以及参与危地马拉暴力事件的情报机构的支持是一个错误，绝不能重蹈覆辙，”他表示。

2010年，当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承认华盛顿在20世纪40年代对危地马拉穷人进行梅毒和淋病实验这一暴行时，同样的眼泪将会落下。一如既往，这一切发生之时，早已无人关心，也对受害者没有任何影响。对当权者亦是如此。

或者说，几乎如此。

新闻自由的代价

1976年，美国参议院发布了丘奇委员会关于国家安全局和中情局

滥用职权行为的最终调查报告，内容涵盖从策划政变和暗杀外国领导人，到监控国内异见人士，以及在文化、学术、媒体、通讯社、工会和宗教团体等领域有计划地引入意识形态宣传。

任何具有一定社会声望的团体或组织都曾遭到渗透，其目的是为了制造支持或反对某事或某人的舆论，或者仅仅是为了阻止某事或某人获得社会关注，使其沉入黑暗并遭到排斥。

1963年，当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比任何人都更早得知巴勃罗·聂鲁达

是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候选人时，便立即发起了一场抹黑运动，通过媒体向左翼读者散布谣言，称1940年列昂·托洛茨基

被暗杀一事，是与这位智利诗人串通所为。⁹

⁹ 这一传闻源于时任领事聂鲁达向这位画家签发的赴智利签证，当时西凯罗斯因涉嫌参与5月24日未遂阴谋而身陷囹圄，距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科约阿坎迪埃戈·里维拉和弗里达·卡洛住宅后方的画室遇刺身亡还有三个月。最终，那年的诺贝尔奖并未授予聂鲁达，而是颁给了另一位

聂鲁达、加西亚·马尔克斯、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以及许多其他人都在华盛顿的“禁止入境名单”上，但与其他人士一样，聂鲁达在1966年成功完成了美国之行，这不仅得益于亚瑟·米勒

及其他美国知识分子的呼吁，还因为公开禁止这些在众多国家备受尊敬的人物入境，有损政府形象。

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

始终紧盯他的动向，不断搜寻能令其难堪的线索，例如马丁·路德·金

对女性的偏爱，以及约翰·列侬那从未被揭露的软肋。

当危地马拉诺贝尔奖得主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另一位对越南战争和美国帝国主义的激烈批评者）被提名为纽约笔会主席时，中情局施压要求米勒获得该职位

。这次他们成功了，但这些“成功”背后的失败将在长期内不断累积。

中情局

及其他间接资助的基金会投入了巨额资金——

这在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组织能做到——

并利用华盛顿强大的情报网络来推广“为艺术而艺术”，以遏制拉丁美洲“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浪潮

，但当他们意识到这股浪潮比冲浪者更强大——

共产主义者——与聂鲁达一样，他也是越南战争的批评者，即让·保罗·萨特。

尤其是因为华盛顿支持的无休止政变最终反而推举出了反抗的作者——

策略便发生了转变。他们转而采取谈判策略，即一方稍作让步，将对手纳入自己的阵营。

也就是说，中情局（CIA）正是利用其特工和间谍——例如霍华德·亨特（Howard Hunt）——并通过其附属基金会，如“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开始在那些大多与这些作家激进思想相悖的文化媒体上，出版聂鲁达（ ）和加西亚·马尔克斯（ ）的作品。

参与这些文化操纵活动的人士，如霍华德·亨特，既不称之为宣传，也不称之为意识形态，而是称之为“捍卫国家”和“传播美国价值观”。

如今，距离导致尼克松总统辞职的水门事件已过去两年，华盛顿方面仅披露了其中一小部分秘密活动。从今往后，这些阴谋和操纵将变得更加隐秘和复杂。

根据现行法律和法规，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 ）的助理弗雷德里克·施瓦茨二世——该委员会由丘奇参议员领导——向美国国家安全局（ ）及其局长索要更多信息。鉴于该局的行动范围不限于美国境内（ ），局长回应称“宪法不适用于美国国家安全局”。尽管这份报告冠以“最终版”之名，但这篇历时十五个月的调查报告却远未触及问题的全貌。

尽管在当时背景下堪称勇敢之举，但该报告仍不免暴露了其文化及主流意识形态（由中情局宣传部门与拉丁美洲主流报纸协同散布）存在的问题，例如当报告认为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与某些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的国际关系，可能成为外国干预的减轻情节时。

这场丑闻——

最终将被其他喧嚣所掩盖，并很快被足够多的民众遗忘——

始于不到两年前：1974年12月22日，《*纽约时报*》在其

头版刊登了泄露的消息，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都试图以“阴谋论”的指控来否认这些信息。

该报指控尼克松政府利用中情局骚扰那些抗议越南战争

及其他和平运动的美国异见人士。文章称，中情局已建立了至少一万份关于和平主义公民的档案，这些人被怀疑并非真正的美国人或缺乏爱国精神。

参议员弗兰克·丘奇

在质询多名特工时，曾指控中情局向记者、作家、学者以及数百家媒体支付报酬，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宣传。中情局拒绝提供名单，但在拉丁美洲拥有丰富经验的权势特工霍华德·亨特

却并未否认任何指控。¹⁰

相反，他不仅予以证实，还将这些行为称为“爱国之举”。最常见的做法之一是在不同国家资助将数千本相关书籍翻译成当地语言或以原语言出版，尤其是那些“悔过共产主义者”或“不偏不倚”的作家所著、符合华盛顿利益的著作。据曾担任中情局特工亨特（ ）——他一度负责管理用于此类文化活动的数百万美元资金——

所述，另一种手段是扩大知名评论家对中情局推广书籍的正面书评的影响范围，或者反之，设法让不受欢迎的书籍获得负面书评。

在美国，针对新闻媒体进行大规模意识形态干预的计划早在1948年就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该计划后来被称为“嘲鸫行动”，以模仿其他鸟类鸣叫的嘲鸫鸟命名。

在拉丁美洲，该计划采用了纳瓦特尔语名称“Sinsonte”（即拥有四百种歌声的鸟），中情局借此在该大陆最重要的报纸上刊登社论和虚构新闻

¹⁰ 有些人，比如悔过的特工菲利普·阿吉（Philip Agee），在其回忆录《公司内部：中情局日记》（*Inside the Company: CIA Diary*）中，直接提到了多家拉丁美洲报纸，这些报纸刊登了由中情局雇员撰写的社论——有时这些社论是从美国发来的——以及经常刊载的包含虚假信息文章。

，尤其是在即将发动入侵、策动政变，或者仅仅需要在美洲国家组织 获得支持性投票的时候。有时，这种舆论造势是通过数百名受雇的撰稿人、廉价的雇佣写手来实现的，或是通过提供机密信息来协助那些无偿工作的作家和记者——

他们往往信念更坚定，且有推动自身职业发展的需求。

在其他情况下，则需要事先与主要媒体的所有者建立良好关系——

这些媒体所有者经常出入那些昂贵的派对和聚会，而中情局或大使馆的特工总会在场，履行着他们的公共关系职责。

阿古斯丁·爱德华兹·伊斯特曼，智利《水星报》

的所有者，也是在圣地亚哥和白宫策划针对阿连德政变的幕后推手，这只是最广为人知的案例之一，其中还包括广播电台、电视台、杂志以及所有舆论导向媒体的所有者或负责人。¹¹

尽管中情局（CIA）

是世界上最严苛、纪律最严明且实力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但它却屡屡遭遇失败，甚至不乏重大挫败。但该机构始终极具创造力，其构想也从未缺乏华盛顿数百万美元的资金支持。1957年被派往乌拉圭时，其特工们常使用通过外交邮袋

¹¹

爱德华兹（

）是“金翅雀行动”在拉丁美洲的主要合作者之一。1993年智利恢复民主制度后，他获得了国家公共关系奖。

寄来的巨型录音机，这些设备每周都会发生故障，过一段时间后，为避免引起怀疑，他们便将它们扔进蒙得维的亚湾。

作为20世纪50年代中情局驻墨西哥行动负责人，亨特

曾成功地在墨西哥城街头张贴大量海报，煽动民众对政府特定政策的反感，并将这些政策与共产主义威胁联系起来。正如爱德华·伯内斯

多年前所证明的那样，一切行动都必须以第三方名义进行，而这些第三方必须是具有社会声望的个人或团体。

这些海报由一些可信的组织署名，而这些组织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用了。正如亨特在其2007年的回忆录中所承认的：“这些被归因于某家受人尊敬的机构的海报，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十年前，为了推翻危地马拉的雅各布·阿尔本斯，中情局动用了多种手段，其中之一是特工大卫·菲利普斯在智利

发明的“锅碗瓢盆示威”，但讽刺的是，这种示威后来却成为了拉美左翼抵抗运动的象征。

最初，中情局曾鼓动“家庭主妇”们通过“锅碗瓢盆示威”来对抗“共产主义影响”，声称这种影响正在耗尽拉丁美洲次大陆家庭厨房的资源。在亚洲，中情局更倾向于资助亲华盛顿的电影，但在拉丁美洲，书面文化却更具影响力。

涂鸦亦是如此。至少作为一项有计划的运动，其首

次行动是由中情局组织的：在危地马拉，32面墙壁和公交车被涂上反对阿尔本斯的标语，指责他为共产主义者。正如应有的那样，也正如“真实阴谋论”手册所言，每一项新创举都应归咎于对手。在其他国家，学生们则会被指控是在响应从国外渗透而来的意识形态。

作为补充，中学生（据中情局在乌拉圭的报告所述，大学生已难以掌控；他们具有过强的意识形态觉悟，因此无法被操纵，建议将资源投入到中学生身上）会在支持阿尔本兹者的家门上张贴海报，上面写着警告：“这里住着一个共产主义者”。

当墨西哥共产党代表访问北京时，亨特——他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家——编造了一个故事，声称这位墨西哥特使诋毁了自己的同胞。他为这次完美的情报工作感到自豪，并记得将该故事发送至华盛顿，在那里，一支技术团队将其翻译成普通话，并模仿了中国某家报纸所使用的排版风格。

当亨特收到这些伪造的副本后，将其转交给了他素有交情的墨西哥记者，该报道随后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并发表。当那位受影响的旅行者提出抗议时（亨特未透露其姓名），一项独立调查证实，在墨西哥泄露的报纸所用的字体与中国原版报纸所用的字体完全一致。

在墨西哥，亨特招募了政界人士、学生和神父，以完成他推翻危地马拉民主总统——雅各布·阿尔本斯——

这一伟大使命，他始终将后者称为独裁者。与金融和政治斗争不同，文化斗争始终由左翼占据上风，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拉丁美洲，这也正是“全球知识界已被马克思主义侵蚀”这一观念得以灌输的原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金钱和情报机构的操纵，真正扰乱自由辩论与思想进程的主要推手正是华盛顿和中情局。亨特资助那些支持其意识形态的墨西哥学生，并将他们派往危地马拉，以放大反共叙事并煽动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中情局不仅投资于在美洲大陆主要媒体上发表文章以直接塑造舆论，甚至还投资于抽象艺术。在美国， “文化自由大会”（在数十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是由中情局构思并资助的，该机构担心不仅科学家和作家倾向于左翼，连视觉艺术家也是如此。¹²

至于像《游击队评论》（*Partisan Review*）这样的文化期刊——

该刊于1934年由美国共产党在纽约创办——从20世纪50年代起便被中情局渗透，并在随后的几

¹² 该基金会会在中情局特工迈克尔·乔塞尔森的领导下，在35个国家开展活动。由于其犹太血统，他在欧洲曾遭到纳粹迫害；而在美国，出于某种原因，他却致力于追查所有可能涉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在其秘密名录中，列有数十家媒体和艺术家，无论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如何，该基金会都会为其举办展览并进行推广。

十年里一直由中情局提供资金支持。

与此同时，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右翼势力竭力散布一种观点，即在马克思主义思潮于拉丁美洲和美国大学中产生实质影响之前，文化领域早已遭到其渗透

。在这个时期，除了面向农村劳动者的广播节目，除了面向工人阶级和城市小企业主的发行量大的报纸社论之外，文化杂志在塑造知识阶层、反抗阶层或领导阶层的舆论方面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它们将永远无法恢复），这一群体虽属少数，但其重要性在美国是无法比拟的。中情局深知这一点，也清楚该将预算结余投向何处。利马的《阿马鲁》（Amaru）、波哥大的《回声》（Eco）以及由哥斯达黎加前总统何塞·菲格雷斯创办的《战斗》（Combate）等拉丁美洲各类刊物，均通过第三方（如幌子基金会）获得了中情局的资助，而其主编们往往对此一无所知。

由著名乌拉圭评论家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 ）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界》（Mundo Nuevo）杂志，曾接受中情局的资助。¹³

拉丁美洲文学“文学大爆炸”的主要作家，如奥克塔

13

仅卡普兰基金会就自掏腰包捐赠了35,000美元，但这笔款项实际上成为了一条“暗道”，从中转出了超过100万美元来自中情局充盈的金库。

维奥·帕斯（ ）、卡洛斯·富恩特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 ）和巴尔加斯·略萨（ Llosa ），以及“另类文学大爆炸”的代表人物，如古巴作家卡布雷拉·因凡特和塞韦罗·萨尔杜伊，都曾在这份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刊物上发表作品并获得推广。当《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揭露了华盛顿的这一新操纵手段后，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

满怀愤慨地辞去了主编职务。在1967年8月出版的《新世界》第14期中，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在蒙得维的亚那份举世闻名的周刊《前进》上，与另外两位备受尊敬的拉美评论家——

古巴人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和乌拉圭人安赫尔·拉马——

持对立立场）发表了一篇题为《中情局与知识分子》的长文，其中针对中情局和斯大林主义的论述略显温和且带有开脱之意。

他声称“我们不属于任何人的宣传工具”，这话或许发自肺腑，但并非事实。他无疑是又一场阴谋的受害者。中情局那些看似可信的欺骗策略往往遵循着相同的模式。

1972年，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被指控资助左翼游击组织“图帕马罗斯”（ ），而他的女儿正是该组织成员。他的女儿被乌拉

圭军事独裁政权逮捕，而他本人则被禁止入境，直至1985年独裁政权垮台。

此次行动的曝光将引发针对中情局及华盛顿在其他国家所采取的其他做法（如政变和暗杀棘手领导人）的大规模调查，而这得益于美国国会中进步派众议员和参议员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这一局面将在80年代因新保守主义运动引发的媒体、宗教和政治反响而逆转。

此外，中情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也必须重新审视其运作方式。如果说它们过去是秘密与欺骗的“学院”，那么从现在起，它们将不得不超越“研究生”水平。由于对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以及少数机密文件解密感到愤怒，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提议采取更激进的措施，以“无条件保密”的新标准来防止未来出现指控。策略是无穷无尽的。据国家安全档案馆披露，基辛格本人曾泄露过机密文件，因此试图惩罚调查委员会；而据揭露了最终导致尼克松辞职的丑闻的记者之一——

卡尔·伯恩斯坦称，恰恰是教堂委员会隐瞒了更具破坏性的信息。

参议员弗兰克·丘奇

于1984年去世，享年59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先后与两种不同的癌症作斗争，先是睾丸癌，随后是胰腺癌。癌症往往是异见人士“自然死亡”的常见原因。当然，这些只是基于单纯巧合的夸大推测。

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绝不会对异见人士的人身安全下手，更不会针对一个曾将他们的一举一动公之于众且颇具人气的异见人士。

在90年代，中情局

对电影和电视节目进行了大量投资。自1996年起，曾参与智利推翻阿连德政变的老将、“秃鹰行动”的参与者以及心理战专家蔡斯·布兰登，成为中情局在拉丁美洲视觉媒体领域的主要操盘手。

布兰登将担任数十部电影的制片人和顾问，这些电影来自探索频道（Discovery）、学习频道（Learning Channel）和历史频道（History Channel）等知名频道，尤其是那些快节奏、受众广泛的娱乐节目。这绝非偶然，进入21世纪后，中情局仍将继续在完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在中东地区绑架、酷刑、操纵信息，或将无辜者的死亡伪装成针对恐怖分子的精准打击。¹⁴

2016年1月31日，《华盛顿邮报》

14

关塔那摩监狱的故事

只是长长名单中最为人熟知的一个案例。例如，2019年《今日美国》披露，在2008年8月22日阿富汗阿齐扎巴德遭轰炸后，美军官员（包括奥利弗·诺斯，他因在“伊朗门”丑闻中向国会作伪证而被定罪，后获特赦）报告称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该村庄的居民以掌声欢迎他们，一名塔利班领导人被击毙，且附带损害微乎其微。但并未报道有数十人丧生，其中包括60名儿童。这只是个细节。

披露了该局一项名为“*Eye-wash*”的策略，其内容是不仅向缺乏经验的公众，甚至向其二线特工散布虚假信息，从而使任何人都无法分辨某件事是真相还是某种阴谋论的产物。在一份发往某外国的电报中，中情局否决了针对目标X的任何行动；而在另一份发给一小撮官员的电报中，则下令搁置此前所有情报，转而执行Z计划。自此之后，那些该死的历史学家即便掌握了某些证据或文件，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他们有所发现时，将会遭到封口，要么被措辞严厉的评论驳斥，要么被受骗的民众嘲笑。

9·11事件后

2003年，历史再次重演，只不过这次不再是《煽动叛乱法》（*Sedition Act*），而是《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它不仅建立了直接审查，还建立了一种更恶劣的审查形式：间接且往往隐形的自我审查。

随着霸权力量

P陷入停滞或增长放缓，尽管《历史的终结》和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仍弥漫着乐观情绪，但对“唯一思想”（d呈增长趋势）的质疑却日益明显，容忍度t急剧下降。历史上，这种下降往往会转化为限制个人自由的法律，甚至是以个人自由之名。

更近期的例子是，当针对种族主义、爱国主义历史以及性少数群体过多权利（ d_x ）的批评——正如当年嬉皮士和反越战运动所做的那样——开始超出可控范围时，人们再次诉诸法律禁令。

以佛罗里达州最近的法律为例，这些由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推动的法律，直接禁止修正主义书籍，并规范公立学校和大学的语言使用——

这只是个开始。人们创造了一个名为“觉醒主义”的恶魔，以取代此前那个名为“穆斯林”的恶魔。

与此同时，那些走狗——尤其是殖民地的走狗

仍在重复几代人前就已形成的陈词滥调：“你怎么能住在美国 却批评这个国家？你应该搬去古巴，那里才是不尊重言论自由的地方”。说出这些陈词滥调后，他们感到如此快乐、如此爱国，以至于让人不忍心用现实来打扰他们。

2023年5月5日，记者朱利安·阿桑奇 ——
因披露了华盛顿
在伊拉克犯下的暴行中的一小部分而被囚禁十余年

给英国新国王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参观伦敦那座令人沮丧的贝尔马什监狱，那里有数百名囚犯正在痛苦地煎熬，其中一些人曾是公认的异见人士。

阿桑奇

被允许享有“自由世界”慷慨赋予的言论自由这一神圣权利

。他的信件被多家西方媒体刊登，这证明了西方的仁慈，以及“那些从‘自由世界’内部批评‘自由世界’的人所表现出的幼稚矛盾”。

十二年来，阿桑奇一直被当作私刑的典型案列。在奴隶制时期，也有少数黑人

被公开处以私刑。其用意在于展示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可能面临的后果，而非通过消灭所有奴隶来摧毁这种压迫性秩序。

阿桑奇

于2024年6月获释，此前他被监禁了12年，并作为一项不乏政治意味的谈判的一部分，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阿桑奇案 与加沙案 -巴勒斯坦
 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阿桑奇的获释不仅呼应了一个世纪前德布斯的获释，更源于一种事实上的增长（这并非得益于权力，而是尽管有权力存在）。如果 d 增加而 P 保持不变或减少（即当前情况），那么 t 理应随之减少。

然而，正是同一股权力在谈判中要求增加 t ，以通过增加 P （在此叙事中指道德层面）来平衡这一方程。

自由主义者的“受监视的自由”

2022年，佛罗里达州的一位自由意志主义州长以这些书籍包含“批判性种族理论”以及他认为“无效”的新教学方法（如社会情感学习，SEL）为由，禁止了54本数学书籍。

他既未解释也未探讨数学书中的哪些段落可能具有反种族主义性质，却以否认派政客特有的风格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宇宙的起源、道德以及蜗牛的性别等问题，大放厥词，言之凿凿却荒谬至极。

媒体和平台制造了一种心理需求，而“否认派”政客则向消费者兜售能缓解这种需求的“毒品”——这种“毒品”包含了所有能想象到的反动成分：安全感、即时满足感、受害者心态。有些幻觉甚至与“白人种族灭绝论”一样古老，该理论诞生于19世纪，当时黑人刚刚获得公民身份，几乎被视为人类。

这种否认政治加深并限制了身份政治的讨论（例如否认种族主义；否认同性恋者的存在），同时掩盖了问题的根源，例如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及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如果不谈论这些，它们就不存在。

这种“产品”畅销至极，正如几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那样，已被加工后出口到南方的殖民地。例如，仅“自由主义”（libertarismo）这一名称——如今已成为阿根廷哈维尔·米莱等拉丁美洲极右翼崛起人物的旗帜——

就是对美国“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s）的照搬

，后者是作为对2008年一位混血儿当选美国总统这一屈辱事件的反应而兴起的。

与“茶党”一样，这些团体总是以所谓“开国元勋”的传统为借口来为自己辩护。甚至在阿根廷和巴西，人们也使用了那面印有蛇图案的黄色旗帜——该图案原本象征着十三殖民地的联盟，但当它盘绕在“勿踏我身”这一标语之上时，倒更像是一个人类粪便的表情符号。

在欧洲、拉丁美洲甚至香港，右翼团体也挥舞着南方邦联那面充满种族主义和奴隶制色彩的旗帜。

许多在美国四驱车上悬挂这面旗帜的美国人，当被提醒这是唯一一个曾险些摧毁他们声称要捍卫的国家（美国）的集团的旗帜时，都会感到惊讶——

该集团的目的是维持奴隶制和白人的特权。许多人甚至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在这个国家，残酷的历史是最根深蒂固的禁忌之一。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自由意志主义保守派、得克萨斯州众议员兼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承

认并谴责了华盛顿的帝国主义传统，并将拉美领导人如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乌戈·查韦斯的所作所为归咎于此。“我们什么都不记得，而他们却什么都记得，”他在一场辩论中说道。

正因这种坚持，他遭到了主流媒体的封杀，而他的许多支持者（其中包括一些仍在投身政治活动的前学生）转而投给了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

“自由意志主义者”这一新绰号，其实是商界的一套老把戏：当一家公司因债务而濒临破产时，便宣布破产，改头换面，然后继续经营同一项业务。新自由主义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它曾在80年代和90年代通过皮诺切特在智利以武力强行推行，又通过国际银行

在其他数十个国家强行推行，最近则由阿根廷的毛里西奥·马克里和乌拉圭的路易斯·拉卡列·普奥推行，结果总是以痛苦的失败告终，不仅在经济上，也在社会上。当然，这种失败并不影响其阶级利益。

*自由意志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同一回事，但自由意志主义者还增添了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和马丁·路德的狂热。这就像天主教神父从容不迫的布道与新教牧师汗流浹背的慷慨激昂之间的区别。

还记得那些70、80年代带着英式口音、在各个街区传教、拯救灵魂（尤其是他们自己的灵魂）的彬彬有礼的年轻人吗？好吧，那颗种子已经结出了果实。

与坚持政教分离的美国开国元勋们（这是启蒙哲学家的遗产）不同，自由意志主义者却将传教士引入了政府。

在巴西，他们曾在国会组织祷告活动；博索纳罗总统的妻子本人就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女牧师；在哥斯达黎加，某位候选人的妻子曾“说方言”来支持竞选活动；更近些时候，米莱议员在议会中援引《圣经》反对征税：犹太人离开埃及是为了逃离奴役以及逃税，就像如今阿根廷的企业家们一样。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且意义深远。

这种否认政治本质上是受挫的成功主义：“右翼懂得治国，只是运气不好”，正因如此才屡屡失败。这种挫败感正是百年前数百万文明的欧洲人支持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如今已无法预见其来临，那正是因为我们身处这场自杀式的荒谬之中。

仿佛这一切狂热还不够似的，德桑蒂斯州长——如今南方那些效仿者亦是如此——

还坚持认为教师和民权活动家在对年轻人进行洗脑，但还有什么洗脑比以上帝、自由、祖国和家庭的名义教导人们否认历史更为激进呢？

还有什么比不断向孩子们灌输“我们是自由的捍卫者”更极端的洗脑呢？声称我们从未为了捍卫经济利益而发动侵略，而是——正如罗斯福和奴隶主们所言——出于利他主义，为了将自由带给那些不懂如何治理自己的黑人国家。

还有什么比否认一段我们本不该负责的历史中的恐怖行径更具有洗脑性？然而，当我们说“我们”时，却又将这段历史据为己有，紧接着又否认自己做过任何错事？

还有什么比将那些长期压迫其他阶级、性别和族群的压迫者塑造成受害者更激进的呢？

还有什么比吉卜林的诗《白人的重担》更激进的呢？这首诗不正是那位一手举着《圣经》、另一手挥舞着皮鞭的“快乐帝国主义者”的旗帜吗？

还有什么比这种“否认政治”更激进、更恶劣的洗脑呢？这种政治允许人们将旧时的集体罪行当作新的部落权利来大肆宣扬。

还有什么比这更激进、更教条、更虚伪的呢？一边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反对“取消文化”的演讲，一边怒斥捍卫自由，可一旦掌权，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法律，禁止说这个、讨论那个、做另一件事？这与美国奴隶主的虚伪如出一辙——他们曾以自由、秩序和文明的名义捍卫奴隶制的扩张。这与跨国公司所扶持的拉丁美洲独裁者毫无二致，而这些跨国公司正是南方那些权势显赫的奴隶主的继承者。

这股陈腐的、靠整容手术重焕青春的右翼势力，其“自由主义”程度之高，以至于只有当底层民众威胁要获得或维护某些权利时，他们才会禁止某些行为。总是打着“法律与秩序”的旗号。正如阿纳托尔·法朗士所言：“法律

以其宏大的公正，禁止富人和穷人同样在桥下睡觉、在街上乞讨以及偷面包。”

心理爱国主义

根据1994年的一项法律（《大屠杀教育法案》），佛罗里达州的公立学校设有一门名为“大屠杀”的课程，旨在学习欧洲针对犹太人民发生的种族主义暴行。

2020年，州长罗恩·德桑蒂斯颁布了另一项法律，要求所有中小学证明其正在向新一代学生传授大屠杀相关知识。

当时，非裔社区的参议员们成功推动将“奥科伊大屠杀”纳入课程，该事件发生于1920年，当时有30名黑人遇害。要理解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社会不公，这就像通过影子来解释人体一样。

此外，根据法律规定，自2022年起，佛罗里达州的这些中学被禁止讨论美国种族主义的历史。

。据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称，理由在于“不应教导任何人觉得自己与他人不同，或因自己的种族而感到羞耻”。

在佛罗里达州，

我们绝不会允许极左翼的议程控制我们的学校和工作场所。佛罗里达州没有灌输思想或歧视的容身之地”。

如果不谈论这件事，那它就不存在。在大西洋这一边，种族主义不存在，也从未存在过。

那些根据肤色将数百万奴隶

（国家繁荣的基础）定义为“私有财产”的奴隶主们，将这种制度称为“奴隶制的恩赐”，他们希望将这种制度“推广到全世界”以“为自由而战”，与此同时，他们却将自己的政体称为“民主”（布朗，1858）。

正是这些人，在淘金热之前就掠夺并灭绝了比那个新生的“淘金热国家”更加民主和文明的原住民，却将其称为面对“野蛮人无端攻击”时的“自卫”（杰克逊，1833；韦恩，1972）。

正是这群人，编造了得克萨斯独立的借口以恢复奴隶制，随后又发动对墨西哥的战争，以侵占其一半领土；正是这群人，在妇女的子女和丈夫面前杀害并强奸她们，却声称这是上帝“天命”的神圣旨意（斯科特，1846）。

那些在菲律宾将杀戮黑人当作娱乐活动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履行“白人的沉重负担”——即文明化世界（吉卜林，1899）。

那些入侵拉丁美洲、腐蚀当地并使其充斥着“香蕉共和国”、摧毁民主制度并建立数十个血腥独裁政权的人，声称自己是为了争取自由与民主（贝弗里奇，1900；《华盛顿邮报》，1920；中情局，第XXX卷）。

正是这些人，在亚洲投下原子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投下数百万枚“造福人类”的炸弹，向数百万民众施放化学制剂，所到之处造成数千人死亡；

他们将这种极端的种族主义行径称为“英雄般的胜利”，尽管那实际上是屈辱的失败（约翰逊，1964；布什，2003）。

但这些事不能提，因为可能会冒犯那些自认为与所有这些自由、民主和神圣正义的捍卫者同属一类的白人。

正如一首为招募志愿者参加那场针对墨西哥的虚构战争而创作的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

*正义是我们国家的座右铭
它永远是正确的（普拉特，1847）。*

这绝非偶然，每当这些狂热分子感到自己的特权受到从未被接受的平等威胁时，他们就会炮制出自我受害论，例如19世纪为辩护殖民主义和对非高加索族群的压迫而提出的“白人灭绝”理论（Pearson, 1893）如今，这一理论又以“人口替代论”的新面貌死灰复燃，将来自非欧洲国家的移民妖魔化为“危险的入侵者”（卡缪，2010）。

绝非偶然，阿道夫·希特勒正是从当时美国极右翼已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中汲取了灵感——这种种族主义曾灌输数百万民众因肤色而自认为优越，同时也迫使另外数百万民众出于同样的理由接受自己的劣等地位（Grant, 1916）。

绝非偶然，希特勒曾向美国商界巨头授予勋章，并禁止在公立学校教授“左派思想”。在迫害和屠杀犹太人之前，他于1933年关闭了著名的包豪斯学校，理由是该校充斥着“反德分子”，且是企图质疑和改写历史的“左派避难所”。

在佛罗里达州乃至全美，教育体系都应从一门名为

“爱国虚伪”的课程开始，以此培养学生直面历史现实的智力能力——

既不加以粉饰，也不受好莱坞、迪士尼世界和三K党的幻想所蒙蔽。

我们无需为祖先的罪行负责，但若通过否认或为其开脱而将其视为己出，我们就必须承担责任。

对于当今因否认现实——

我们带着狂热将其称为“爱国主义”——

而犯下的罪行与不公，我们同样负有责任。

这是一种犯罪且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的否认主义，因为它再次以不触动他人敏感神经为由，剥夺了正义以及受害者知晓真相的基本权利——

而“他人”正是两个多世纪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他们坚持采取自满和自我受害的策略，以此来平息自身的挫败感及其根深蒂固的仇恨。

更糟糕的是，当这一知情权被法律和充满禁忌的文化所剥夺时，这一切都是以民主之名进行的——这种民主对他们来说是个障碍，他们利用它，就像古雅典的煽动家们

利用民主来妖魔化并最终处决苏格拉底

一样，只因他提出了过多的质疑。毋庸赘言，这一切都是合法的，直到法律由他人来制定为止。

还有什么比否认历史或禁止重新审视历史更严重的洗脑呢？还有什么比在学校强加共谋式的沉默或一种“爱国史观”——这种史观充斥着事后编造且缺乏文献依据的神话——更严重的洗脑呢？

问题在于他人的自由

让我们先重申一个存在数十年的观点：“反堕胎”这一定义不仅极其虚伪，而且默认了“支持堕胎”的运动就是“反生命”的。即便是那些自称“支持堕胎”的人，也绝不会认为堕胎是件好事或乐事，而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作为结构性、社会性、文化性及个人性问题所导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之举。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在案中作出的、针对特殊情况下堕胎权（交由各州自行裁量）的裁决，不过是回归中世纪道路上的又一个站点。

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变迁（很可能是对历史上更大规模的进步运动——即向“平等自由”扩展的运动——

的一种反响），而是像往常一样，成为一种战略的一部分，旨在保护那些经济上的微型少数群体，这些群体终将成为新一代人冲突与诉求的焦点。他们心知肚明，因此需要通过制造政治组合来转移视线——

将他们的政治经济纲领与某种广受欢迎的神明，或

根植于社会的私人道德狂热相结合。在盎格鲁-撒克逊

、新教世界中，这种元素必然带有某种性与清教主义的色彩。那些以基督教之爱为名、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军事十字军东征，被视为理所当然。

去年，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这位2024年白宫竞选的主要候选人——

因决定在中小学禁止提及“批判性种族理论”以及任何其他质疑或揭露该国根深蒂固种族主义的史书和数学教材而登上头条。

同样，他还成功推动了所谓“禁止说‘同性恋’”法案的通过，根据该法案，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可以谈论战争、毒品和强奸，却不能提及那些与我们略有不同、与众不同的人的存在。既然他们——

那些“异类”——

不会干涉我们的私生活，我们便干涉并立法规范他们的生活，将他们视为禁忌。这不仅摧毁了年轻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的心理健康，更将我们的异性恋子女重新关进了那个该死的——那个我们曾深受其害的、充满压迫且令人恐惧的有毒大男子主义牢笼。

最高法院也处于同样的立场和方向。尽管从未公开承认，但最高法院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机构，正因如此，每当其九名成员中有人去世或退休时，国会就会围绕根据其意识形态倾向任命新法官一事，以及围绕其性取向或其他转移注意力的争议，展开一场绝望的争夺战。

其大多数成员（9人中的6人）是由共和党保守派总统提名的。

其中五人由乔治·W·布什（2）和唐纳德·特朗普（3）两位总统任命，他们二人都是在总统大选中输掉普选票后，凭借一套专为保护19世纪人口稀少（主要是白人）但势力强大的南方奴隶制体系而设计的选举制度，才得以入主白宫的。

其强大源于狂热。正是这种狂热，在2020年6月，动用军事化的警察部队镇压了黑人公民抗议警察种族主义的和平示威；而六个月后，

2021年1月6日，又用木棍对抗那些全副武装、手持枪支的白人新邦联分子——

这同样是那个令人畏惧且令人畏惧的奴隶制南方所延续的另一项传统，其目的正如联邦调查局所知，是企图通过冲击国会、阻止新当选的民主党总统获得确认来发动政变。

这种基于“特殊权利”的权力，源自一个主要由南方邦联崇拜者和自诩为受害者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组成的群体——

而正是这个群体，曾真正危及了他们如今声称比任何人都更捍卫的这个国家的存续。这些人一边大谈爱国主义，一边又策略性地指责批评者（而批评者正是任何民主制度的本质）是“反美分子”。

这个将“多数派”视为教条的少数派，在2016年2月自由派（按美国说法即左翼）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去世后，迎来了一个最高法院的空缺。根据

惯例，民主党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有权提名继任者，而该人选显然会与其政治立场一致。共和党人阻挠这一提名近一年之久，直到新任共和党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才得以提名保守派尼尔·戈萨奇。

最高法院最新入职的成员印证了这一逻辑。2020年

年9月18日，距离乔·拜登最终胜选的大选仅剩一个多月之际，自由派大法官露丝·金斯伯格去世。共和党人以创纪录的速度提名并批准了其保守派候选人艾米·科尼·巴雷特，时间是2020年10月27日，即大选前几天。

由于最高法院（一个高度政治化且主要由男性组成的机构）作出的这一决定，政府机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预计，黑人女性的妊娠相关死亡率将上升33%。对于成千上万的女性而言，怀孕将意味着一张死亡判决书。

在这条通往中世纪的道路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最高法院的一名成员——

极端保守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
在书面意见中明确指出：

“在未来的案件中，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本法院关于正当程序的所有实质性判例，包括格里斯沃尔德案[1965年，关于避孕药具的使用]、劳伦斯案[2003年，反对将同性恋定为犯罪]和奥伯格费尔案[2015年，支持同性婚姻]。”

换言之，这位最高法院的资深保守派大法官声称，迈向这种“新中世纪主义”的下一步将是禁止同性婚姻，将不同的性取向和服用避孕药定为犯罪。

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这条历史倒退的道路走下去，就会发现下一步将是禁止离婚和跨种族婚姻——后者在1967年最高法院撤销禁令之前一直是非法的，当时托马斯大法官才19岁。

当然，这位“皈依者”萨沃纳罗拉的目标可能会遇到阻碍。这位被新教保守派、天主教徒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奉为英雄的大法官，其实是一位黑人（或称“非裔美国人”，尽管事实上他比白人埃隆·马斯克更不“非裔”），且已再婚，其妻子是保守派活动家吉妮·兰普

一位金发女子，茶党成员，同时也是“自由中心”（Liberty Central）和“自由咨询公司”（Liberty Consulting）的创始人。

“自由”（*liberty*）这个词是多么美好。谁会反对自由呢？大家都热爱自由。

当然，前提是这不涉及他人的自由。

以言论自由之名禁止思想

与巴西总统贾伊尔·博索纳罗上尉保持一致，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签署了一项法律，允许大学生录制教授的授课内容，以察觉其是否存在某种意识形态倾向。当然，前提是这并非真正的意识形态。

同年12月，州长又签署了一项法案，旨在“为企业、员工、儿童和家庭提供必要的工具，以对抗所谓的‘WOKE’（非裔美国俚语，意为‘觉醒’）洗脑”，该运动提倡从边缘群体视角重新解读历史。

在狂热分子眼中，每周带一个五岁孩子去宗教场所，或者每天让他坐在电视机前四个小时消费商业宣传，这都不算“灌输”。但如果一个20岁的年轻人进入大学，有可能接触到一些新思想，那才算是“灌输”和“洗脑”。

那项禁止公开讨论种族主义的法律（接下来恐怕就要禁止“*和“imperialismo”*这些词了），理由是白人青年在学习奴隶制和歧视问题时可能会感到不适；此外，同一部门还出台了另一项法律，

该法令以“反对性别意识形态”之名，禁止公立中学讨论同性恋者的存在。而数百年来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大男子主义——

却从未被质疑。相反，人们正凭借狂热的无知竭力维护它。

这些“自由捍卫者”的一贯伎俩就是禁止一切不符合其利益的事物，例如《个人自由法》就禁止任何企业要求员工参加反种族主义意识培训课程。他们反复鼓吹的“言论自由

”实则是骚扰和审查的自由。

教育和学术界这股禁令海啸，不过是此前在美国发起的数十本禁书行动

的延续，完全是“香蕉共和国”的作风。

这种意识形态，连同其从美国自由主义者那里照搬的措辞和套路，在拉丁美洲被像“复制粘贴”一样反复制，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中情局

在数十个国家植入的文章和学说——

这些思想在冷战结束数十年后发芽、成熟，并持续结出“果实”。

他们迟早会把矛头对准大学。这是“成功商人”及其走狗心中最大的心头大患。文化和大学向来难以被收买，尽管企业已在将教育和研究商品化方面做得相当成功。据保守派狂热分子所言，大学是自由派（左翼）的据点，是向青年灌输意识形态的地方。

他们抱怨大多数教授是左派，因此必须通过立法来平衡保守派的比例。然而，对于那些权势显赫的教会、身家数百万的企业、证券交易所、华盛顿的强大游说团体

，以及对政党的无限额捐款，却没有任何类似的提案来平衡其意识形态。

要平衡大学里的政治倾向，最自然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这些“未来商界精英”在他们他妈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认真学习。但当然，如果有人贪图金钱和权力，就很难愿意花几十年时间去做无偿的研究。

尤其是当他们深知，在他人付出数十年努力后，一旦研究成果问世，那些“成功商人”就会以“自由”之名立即将其据为己有。

理论上，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是相互对立的。然而，几十年来，（经济）新自由主义却成功地将五花八门的元素打包成了一套组合。于是，同一个政党里既包括最激进的资本家和好战分子，也包括那些与《福音书》中耶稣

毫无瓜葛、反而更像犹太的基督徒——

那个为了三十块银币出卖自己朋友的人。

因此，捍卫耶稣意味着既要捍卫那些被不公正地赶出圣殿的商人，又要让那该死的骆驼穿过该死的针眼，还要捍卫那些将其他反抗者钉上十字架的帝国。

那些金钱主子、那些在世界各地散布香蕉共和国式独裁政权

，并在本国推行合法化独裁统治的企业董事会——这一切都打着自由与民主

的旗号，恰如奴隶制时代一般——

竟成功地将这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了一起。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新自由主义者就是当今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与新纳粹分子和新法西斯分子在酒吧里喝得尽兴，毫无违和感。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圣办公室”狂热追随。2022年8月，联邦法官马克·沃克（Mark Walker）以该法律规定“教师只要表达

仅表达州政府批准的观点，即可行使‘学术自由’”为由，（暂时）叫停了佛罗里达州的“反觉醒”法案。这虽合乎逻辑，但只是暂时的。一个月后，德桑蒂斯州长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他成功连任州长，并跻身共和党2024年总统大选最有力的候选人之列。

每当一位保守派政客煽动“宗教裁判所”的怒火时，总能取得极佳的选战成果。这再次证明，我们仍在朝着一个新的中世纪迈进。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学术界以及曾经为民权而英勇抗争的力量的沉默、怯懦或默许之下。

当一些学者过于沉迷于构建一个解释马尔代夫通货膨胀的模型，或是琢磨如何在了一本无人问津的期刊上引用苏格拉底时，商界人士却仍在推进他们的计划，企图瓦解或接管社会中最后几个他们尚未完全掌控的角落——尽管教育早已被商品化。

我曾听人说：“哎，那是教授们的工作嘛。”也就是说，他们不该插手大政治。那不是他们的本分。

但对于一位成功的赌场老板，或者一位立志成为州长或总统的枕头推销员，人们却不会这么说。不，因为这些“成功人士”

商界人士早已习惯了发号施令并取得成功.....

不少教师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害怕在教职工大会和走廊里反复被提及的“*fear of retaliation*”（报复恐惧）——

即因直言不讳而遭受报复。即使是拥有“*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也害怕抗议，尽管从法律上讲他们是不可解雇的。

在美国

，终身教职制度于1940年设立，旨在防止教师因持有激进或不合时宜的思想和观点而被解雇。

正因如此，多年来终身教职制度在美国一直备受攻击。人们不仅试图废除它，而且已将其范围缩减到最低限度，其目的有二：（1）使学术工作变得不稳定（压低薪资）；（2）压制那些与主流教条相悖的理论。

但享有终身教职的教师们还担心其他形式的报复。例如，薪资被削减——

对此，当局若不诉诸基于主流教条的幼稚借口（例如供需法则.....），便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仿佛这条法则本身不就充满了政治色彩似的。

就这样，我们教师在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承诺、对变革性知识的追求、对既定规范的挑战，以及为建设更美好的社会和世界而进行的斗争中，也被削弱了力量。

迪克西之地

正如历史所示，当一种权力（P）因异议——多样性

（d）的失控增长而受到质疑时，其反应导致了对这种异议与多样性的宽容遭到反制，并通过法律手段使宽容度（t）急剧下降，

正如19世纪发生的那样，当时废奴主义的运动浪潮和舆论开始威胁南方强大的奴隶制体系的存在。

2022年，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以这些书籍包含“批判性种族理论”以及他所称“无效”的新教学方法（如社会情感学习（SEL））为由，禁止了54本数学书籍。

他既未解释也未探讨数学教材中的哪些段落可能具有反种族主义性质，却以否认论政客特有的风格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宇宙的起源、道德以及蜗牛的性别等问题大放厥词，言之凿凿却荒谬至极。

德桑蒂斯州长因决定禁止在中小学中使用提及“批判性种族理论”（
）以及任何其他质疑或揭露该国学校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历史和数学教材而登上头条。

就在今年，这位州长成功推动了《家长教育权利法案》（俗称“不许说同性恋”）的通过，根据该法案，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可以谈论战争、毒品和强奸，

却不能提及那些与我们略有不同、有些“奇怪”的人的存在。

既然这些“不存在的怪人”不会干涉我们的私生活，我们便要干涉并立法干涉他们的生活，将他们视为禁忌——

这不仅摧毁了年轻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的心理健康，更将我们的异性恋子女重新关进了我们曾饱受折磨的、充满压迫且令人恐惧的有毒大男子主义牢笼之中。

一年前，即2021年，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与巴西新法西斯主义总统贾伊尔·博索纳罗上尉步调一致，制定了一项法律，允许大学生录制教授的授课内容，以侦测其意识形态倾向——只要那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

同年12月，州长又签署了一项法案，旨在“为企业、员工、儿童和家庭提供必要的工具，以对抗所谓的

WOKE’（‘觉醒’，非裔美国俚语）洗脑”，该法案提议从边缘群体视角重新解读历史。

在狂热分子眼中，每周带一个五岁孩子去宗教场所，或者每天让他坐在电视机前四个小时消费商业宣传，这都不算“灌输”。但如果一个20岁的年轻人进入一所大学，有可能接触到一些新思想，那才叫“灌输”和“洗脑”。

那项禁止公开讨论种族主义的法律（接下来恐怕就要禁止“帝国主义”一词了），理由是白人青年在学习奴隶制和歧视问题时可

能会感到不适；此外，同一部门还出台了另一项法律，

该法令以“反对性别意识形态”为名，禁止在公立中学讨论同性恋者的存在。而数百年来的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大男子主义——

却从未被质疑。相反，人们正凭借狂热的无知竭力维护它。

迟早他们会把矛头对准大学。这是“成功商人”及其走狗们心中最大的心头大患。文化和大学向来难以被收买，尽管企业通过

将教育和研究商品化，已做得相当成功。据保守派狂热分子所言，大学是自由派（左翼）的据点，是向青年灌输思想的地方。

他们抱怨大多数教授是左派，因此必须通过立法来平衡保守派的比例。然而，对于那些权势显赫的教会、身家数百万的企业、证券交易所、华盛顿的强大游说团体

，以及对政党的无限额捐款，却没有任何类似的提案来平衡其意识形态。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圣办公室”深信不疑。2022年8月，联邦法官马克·沃克（Mark Walker）以该法律规定“教师只要表达国家认可的观点，就可以行使‘学术自由’”为由，（暂时）阻止了佛罗里达州的“反觉醒”法案生效。

这虽合乎逻辑，但只是暂时的。一个月后，德桑蒂斯州长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他成功连任州长，并跻身共和党2024年总统大选最有力的候选人之列。

在另一个拥有深厚拉美裔历史传统（这一传统备受推崇），同时又对剥夺历史的悲剧进行着执拗压制的州——

得克萨斯州，2021年也通过了一项法律，限制并管控学校中关于种族问题

及奴隶制历史的讨论。出于恐惧，一些教师暂停了部分课程，并修改了教学大纲，以避免面临诉讼、解雇或家长的批评。

尽管该法案的措辞披着政治正确的伪装——例如禁止提及“某一族群或性别天生优于另一族群或性别”——

但其目的在于扼杀关于该国种族主义历史及主流话语中性别歧视现象的日益高涨的讨论。

没有什么比禁止使用“黑人”一词更能阻断对相关言论的审视了——

在媒体、国会及白宫的记录中，“黑人”一词以欺骗性而非学术性的方式出现了上百万次。

2023年5月，得克萨斯州立法者投票通过决议，要求在该州所有公立教室悬挂《圣经》中的“十诫”，以挽救帝国的道德。在迪克西地区其他州的某个小镇市政厅里，看到这些石板也并不罕见。麦卡锡主义卷土重来。

那些所谓的“开国元勋”在坟墓里都翻身了。十字军和宗教裁判所为这种强制皈依欢呼雀跃，尽管他们尚未将“犹大之椅”施加于本国公民身上——就像他们在

这些无法无天的酷刑中心（如关塔那摩）或中情局在各大洋及各国维持的众多秘密监狱中所做的那样。

这些不过是一个帝国衰落的新征兆——这个帝国既不知前路何方，也无法以不同于自17世纪以来一贯的方式看待世界及其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在其新殖民地中，走狗们仍在像念珠般反复高呼：“自由，自由！”

一年后，即2024年6月，另一个迪克西州的卢西亚纳州通过了一项法律，强制要求公立学校在墙上用大字展示（《圣经》中的）“十诫”。

尽管这与宪法相悖，也违背了托马斯·杰斐逊等备受尊崇的开国元勋的所有著作，这位南方州的州长仍为这一决定辩护：“若要尊重法治，就必须从最初颁布的律法开始，那就是摩西……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了诫命，”兰德里州长说道。

我们回到 $t = P/d$ 这一公式。显然，在所有情况下，这都是一种针对 d “危险增长”的反制反应——这种增长会导致 t 急剧下降，从而维持一个日渐衰弱且岌岌可危的 P 。

不做殖民地的代价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霸权势力

及其走狗的反例。你为什么不去古巴

呢？那里的人民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多党制？

首先，有必要指出，所有政治体制都具有排他性，尽管程度各异。在古巴

，不允许自由派政党参与选举，而这些选举被自由民主国家斥为了一场闹剧。在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例如美国，选举基本上就是由名为民主党和共和党

的“一党”进行的。第三党根本不可能对“一党”构成实质性挑战，因为该党代表的是企业集团——而这些企业集团正是掌握国家实际权力的精英阶层。

另一方面，例如，如果在乌拉圭这样的国家，一位像何塞·穆希卡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赢得大选，或者在智利，另一位像加布里埃尔·博里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获胜

，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去想象这些总统会超越宪法框架

，将这些国家变成其宪法所禁止的苏联式体制。古巴的情况也是如此，但必须指出，这并非同一回事。

现在，让我们回到不同全球权力体系中言论自由的逻辑

。简而言之，我认为有必要考虑到，言论自由是一种奢侈品，历史上，那些正在争取从帝国统治下独立的殖民地 或共和国，根本无法享有这种自由。只需回顾危地马拉民主制度

的例子即可：1954年，该国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决定执行本国的主权法律，而这些法律不符合跨国巨头“联合水果公司”的利益，因此被美国“伟大民主”摧毁。美国“伟大民主”毫不犹豫地扶植了另一场独裁统治，导致数十年间数十万人丧生。

伊朗、智利、刚果、印度尼西亚、布基纳法索.....同样的情况比比皆是。这还仅限于冷战时期。

20世纪50年代，危地马拉的民主

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正是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正因如此，北方帝国和联合水果公司（UFCo）才得以通过一场蓄意策划的宣传运动来操纵该国的公众舆论——这一宣传运动甚至被其

实施者们自己所承认——

当然，这绝非其当地走狗所为，这一点不言而喻。

当时，这位年轻的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格瓦拉正身处危地马拉，不得不逃往墨西哥流亡，在那里他遇到了其他流亡者——

古巴人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

。当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时，此时已被称为“切”的埃

内斯托·格瓦拉，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古巴绝不会成为另一个危地马拉。”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古巴不会像危地马拉那样，被“自由媒体”所同化。历史证明他是对的：1961年，华盛顿根据中情局的计划入侵古巴，该计划曾断言“古巴将成为另一个危地马拉”，结果却以惨败告终。为什么？因为古巴民众并未响应这场“解放入侵”，他们没有被“自由媒体”所传播的大规模宣传所洗脑。肯尼迪深知这一点，并因此指责中情局，中情局曾威胁要解散该机构，最终也被解散了。

历史的终结

随着苏联的解体

，一场自由主义乐观主义的狂欢随之而来。但这更多只是空谈。当自由主义精英们在几乎全球范围内掀起的激进私有化浪潮中尽可能地攫取利益时，一个幽灵在宴会厅中游荡。

倘若人们最终相信了“民主

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一说法，并开始要求社会权利以及对原本从未民主过的经济进行更深层次的民主化，那该怎么办？

正是在这一时刻，作为对明显衰弱的 $d(a)$ 的反应，潜在的 d_b 开始壮大，并——

尽管披着“唯一模式”的面具——

尤其开始展现为一股失控的力量。

这一切都发生在 P 的霸权力量

急剧扩张的背景下。绝非偶然，在弗朗西斯·福山教授那本具有范式意义且充满辩护色彩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1992）之后，另一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也出版了同样具有范式意义、却更具末日色彩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

我们于2021年出版的《狂野边境》一书，通过一章内容概括了这一时刻，该章标题

概括了这一观点：“1998年。胜利者感到不安”。这一章提到了“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该计划曾决定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

三周后，即2月19日，比尔·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在接受NBC电视台《今日秀》节目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为此“我们必须动用武力，我们就会动用，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我们能够比任何其他国家看得更高、看得更远”。*

2003年2月，尽管联合国反对且全球范围内抗议声浪高涨，美国、英国和西班牙（据其总统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

所言，该国急于“走出历史的死角”）仍以伊拉克独裁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实施了梦寐以求的伊拉克入侵。

当这些武器在历经数年搜寻且这场冒险导致一百万人丧生后仍无迹可寻时，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将承认自己掌握了错误情报，并表示，无论如何，中东地区的屠杀与动荡

并非坏事，因为这促进了该地区的民主。他们不会承认自己撒了谎————因为这太难看，而且他们的诚实也仅此而已。一切最终将归结为一句道歉，这在最好情况下，也只是权贵们惯常的做法。

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的成员包括新保守主义作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未来的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未来的国务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未来的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以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未来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

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发布的报告《重建美国防务（Rebuilding America's Defenses）》表明，尽管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成本最高、实力最强的军队，但华盛顿仍感到不安全。作为对美国六十年代的反响而复兴的军国主义，已作为物质和意识形态上的现实得以巩固，但新保守主义者并不满足。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的游说团体在其建议中明确指出，美军必须在全球任何地方消除一切竞争。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必须被武力推翻，整个中东地区必须按照华盛顿的计划进行重新规划。然而，要说服美国民众支持使该计划得以实现的行动将需要很长时间，除非发生“一场具有催化作用且

灾难性的事件，类似于新的珍珠港事件”。比如对世贸中心双子塔的袭击？¹⁵

在丘奇委员会
和美国历史上最富批判精神的国会
通过了一些限制中情局
随意实施暗杀权力的法律之后，2001年，乔治·W·
布什总统
批准了一项决议，赋予中情局及其他机构“既当法官又当刽子手”的权利，允许它们以反恐之名清除个人并决定实施大屠杀。
正如调查记者埃文·赖特所解释的那样（仿佛是对冷战时期中情局手册的回响
），这一使政府特种部队和黑水公司
等私营企业得以在没有总统命令的情况下实施暗杀的机制，其目的在于让公众人物（即那些依靠选票当选的政治家）免于承担任何刑事责任。¹⁶

¹⁵ 该文件第51页指出：“此外，转型进程——即使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在缺乏某种灾难性且具有催化作用的事件（例如新的‘珍珠港事件’）的情况下，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¹⁶ 在这些政府雇佣军中，将出现古巴人恩里克（瑞奇）·普拉多（Enrique (Ricky) Prado）的身影——他同样居住在迈阿密海滩，曾被指控犯下多起悬而未决的谋杀案，随后他在中情局步步高升，最终晋升至SIS-2部门。黑水公司，从华盛顿获得了数亿美元的资金，这是一家由极端保守派基督徒埃里克·普林斯（Erik

Prince) 创立的私营军队，他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未来教育部长贝齐·德沃斯 (Betsy DeVos) 的兄弟。

掌权者往往无视自己的法律

1854年7月13日，美国海军

炮轰尼加拉瓜的圣胡安，将其从地图上抹去，据霍林斯舰长所言，这是为了给尼加拉瓜人“上一堂永生难忘的教训”。这种暴行是对该国水域内一起微不足道事件的回应。一艘名为“H. L.

Routh”号的现代全铁制蒸汽船，在圣胡安河上与一名商人的小船发生了碰撞。

这艘属于安东尼奥·帕拉迪诺先生的木制小船遭受了严重损坏，因此帕拉迪诺对蒸汽船船长出言不逊。Routh号的船长T.T.史密斯虽听不懂当地语言的辱骂，却能察觉其语气，便威胁要鞭打他——

这种做法在“文明”的奴隶主中司空见惯。据部分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乘客证词

所述，“劳斯号”似乎失去了舵控，并在距离圣胡安十一英里处偏离了航道。撞击和辱骂发生几分钟后，“劳斯号”倒车并回转，朝那艘小木船驶去。感到受辱且怒不可遏的史密斯船长手持步枪，向嚣张的帕拉迪诺开枪。

其中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史密斯仍不甘心，继续猛烈撞击那艘木船，直至将其撞得支离破碎。在“劳斯号”上，作为该船所有者的纽约“Accessory

Transit Company”的成员们，又回到了各自的餐桌旁。除了少数乘客的抗议外，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次日，圣胡安德尔诺特（San Juan del Norte）的警长手持逮捕令，试图以谋杀罪名逮捕史密斯船长。其中一名“劳斯号”乘客——美国驻中美洲全权公使、前阿肯色州参议员、未来南方邦联战士、南方种族主义者索伦·博兰德（Solon Borland）——索伦·博兰德（Solon Borland），拒绝阅读逮捕令，并（据5月30日《匹兹堡公报》报道）宣称尼加拉瓜官员“无论犯下何种罪行，均无权逮捕美国公民”。博兰德的武装比尼加拉瓜官员更精良，他命令警长（一位瘦削的黑人，其姓名已从历史记载中消失，此处提及肤色仅为描述）从原路返回。警长及其手下随即撤离。

这一幕以不同形式持续了超过一个世纪，且不仅限于拉丁美洲。例如，2020年7月21日，特朗普政府对被指控腐败的委内瑞拉最高法院院长迈克尔·莫雷诺发布了逮捕令，并悬赏500万美元缉拿其归案。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解释了这一决定：莫雷诺“收受贿赂以影响委内瑞拉某些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通过这一声明，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美国反对腐败”。2001年8月，针对西班牙法官巴尔塔萨尔·加尔松

要求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因其参与拉丁美洲独裁政权

一事在国际法庭作证的传票，乔治·W·布什政府

发表声明抗议称：“一位本国杰出的公仆遭到外国
法院的骚扰，这是不公正且荒谬的。

国际刑事法院的危险之处在于，总有一天美国公民
可能会像本案一样，因政治动机而在国外被逮捕。

”

尽管残暴、暴力、违反国际法、摧毁他国民主
制度，以及通过从常规炸弹到化学武器等各类轰炸
手段屠杀数百万人的行径，已成为美国
几乎所有总统

所确立、践行并引以为荣的传统，但其中却从未有
人被送上任何法庭。

从未有人因弹劾而遭罢免。理查德·尼克松

因一场微不足道的丑闻提前辞职——

相较于他漫长的政治犯罪记录，这简直微不足道——

—

将权力移交给了副总统。而其他所有人却因其罪行
而备受尊崇和颂扬。

首位不得不面对陪审团和法庭的前总统是唐纳
德·特朗普。

他那长长的非法行为清单——
或者至少是那些值得调查的行为——

让当时的新闻记者和检察官的工作变得相当轻松，

甚至达到了历史性的地步：2024年6月，他因伪造

与私人商业活动相关的文件被判定有罪，尤其是那

些涉及逃税或税务申报数据造假的文件。

至于更严重的指控，例如试图操纵2020年大选，或煽动针对国会（当时正试图确认该次大选获胜者乔·拜登）的暴乱，则因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迅速裁决而搁置。

九位大法官中有六位投票支持承认特朗普总统在其总统任期内所作所为享有豁免权，这一决定标志着二战后美国政治体系中总统权力不断增强这一长期趋势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事实上，是迈出了好几步）。⁶

法院的这一裁决增强了美国总统的权力，无论其属于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也就是说，它增强了“一党制”的行政权力，使其与经济和金融权力相辅相成。这是“ P ”向西扩张的又一步，以牺牲“ t ”为代价，并对抗“ d ”， $dP = dt$ 。

在“ d ”的质疑和围堵下，霸权力量沦为“香蕉共和国式”的权力，并开始采用以往仅用于其殖民地的手段来镇压“ t ”。

撒谎是我们的职业

2019年4月15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斜倚在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礼堂舞台上的一把皮椅中，聆听一名学生的提问。该学生要求他解释对某些国家实施制裁的政策，以及对沙特阿拉伯等其他政权所作的让步。国务卿以谈论外界世界的严酷性作为切入点，试图寻找答案。

虽然没能找到答案，但他脑海中却浮现出一个自认为很有趣的想法。他内心忍不住发出一阵笑声，震动着他那三百磅重的身躯，问道：“西点军校学员的座右铭是什么？‘不撒谎、不欺骗、不偷窃，也不允许他人这样做。’“好吧，我曾担任中情局局长，我可以向各位保证，我们确实会说谎、欺骗和偷窃。我们为此专门开设了整套培训课程。这恰恰让我们想起了美国实验的伟大之处。”台下观众报以阵阵笑声和掌声。

虚假新闻 早在1836年得克萨斯州独立之前就已盛行，并在1844年开始的对墨西哥战争期间大量涌现。到19世纪末，随着纽约“黄色新闻”的出现，虚假新闻演变为一种大规模且更精巧的策略，通过捏造1898年对西班牙的战争来提升销量。20世纪初，爱德华·伯奈斯将“假新闻”系统化，这被用来为美国介入第一次世

界大战 以及1954年危地马拉 等政变造势。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将操纵公众舆论作为首要武器，并采取多种手段：
在军事干预前夕向该地区主要报纸植入社论，或以
此迫使国际社会谴责、封锁或骚扰那些不顺从华盛
顿政策及跨国公司利益的总统。

为此目的而成立的组织、基金会和机构数量众
多且形式多样，但都具有某些共同特征。20世纪80
年代，在罗纳德·里根总统
的批准下，古巴裔的奥托·赖希
创立了“拉丁美洲公共外交办公室”，该机构本应在
1989年被关闭，因为其利用五角大楼 和中情局
的资金操纵公众舆论的行为被曝光。
该办公室与中情局心理作战部
合作，并通过奥利弗·诺斯上校
直接向白宫汇报。其策略之一是在主流媒体上刊登
评论文章，并伪造情报泄露事件以影响公众，制造
针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派
等群体的恐慌或恐惧，同时将反政府武装
塑造成英雄般的“自由斗士”。¹⁷

¹⁷ 刊载了“该办公室”捏造报道的媒体包括《迈阿密先驱报》
、《新闻周刊》、 《华尔街日报》、
《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以及NBC等多家电视台。
任何对尼加拉瓜政府
有利的信息都将被斥为“桑地诺宣传”。奥托·赖希
及其办公室泄露的各种消息解释称，这种信息歪曲的原因在

赖希曾编造出苏联飞机已抵达尼加拉瓜、该政权已拥有化学武器并涉足毒品走私等谣言，其效果之显著，以至于国会中开始出现支持对马那瓜发动空袭的声音。直到数年后，那些最严谨的记者才发现，他们从“可靠消息来源”获得的信息其实是粗劣的操纵。

该办公室因未经国会批准，利用国务院资金传播隐蔽宣传和虚假信息而被勒令关闭。其罪行并非通过虚假新闻操纵公众舆论，而是挪用了不属于该机构的资金。

1988年9月7日，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机密文件中记录道，“这一群体”的计划是通过媒体影响公众舆论，从而促使美国国会进行一项符合其利益的投票。该集团在开曼群岛和瑞士银行开设了账户（用于洗钱，这些资金来自通过以色列向伊朗出售武器的交易），并得到了奥利弗·诺斯上校的协助。奥托·胡安·赖希将继续担任老布什和小布什总统的顾问，并于2012年获得沃尔特·贾德自由奖。¹⁸

于美国记者从尼加拉瓜政府那里获得了性好处——当记者是异性恋时是女性，当记者是同性恋时则是同性恋者。

¹⁸ 尽管古巴流亡者仅占美国整个拉丁裔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若将美国境内的所有古巴人计算在内，则占拉丁裔人口的4%），但他们在中央情报局及各类商业机构中的代表权和政治影响力几乎是绝对的，并在媒体、政界以及美国国会中占据主导地位。

无论出现何种不利于它的揭露，操纵公众舆论这一手段都不会被放弃。

在众多强大组织中，伦登集团（Rendon

Group）将继续延续这一传统。五角大楼

将向伦登集团支付费用，以传播虚假信息作为战争武器。这一策略与上世纪爱德华·伯内斯

所采用的策略如出一辙：让某些具有一定声望且与我们无关的人士（医生、宗教领袖、主流媒体）说出他们希望人们相信的话，从而捍卫自由与民主。

伦登成功地泄露并植入信息，这些信息随后将由“独立记者”发布，其中一些人实际上在五角大楼的薪资名册上。约翰·伦登曾受雇操纵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

，他曾自夸道：“我可以告诉你，明天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报纸上会刊登什么头条新闻。”

他的名下有来自全球43个国家的195家报纸，这些媒体都会转载他的观点。

“负责任异议协会”（ARDIS；其成员包括前海军陆战队员、前中情局特工 和前联邦调查局特工等）的任何一位创始人，都会补充说，蓬佩奥国务卿

忘记提及的是，我们不仅“说谎、欺骗和偷窃”，还杀人。

1987年，ARDIS估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至少有600万人死于美国 的秘密行动.....这些人甚至从未与美国交战”，而这一切都是“以美国人民的名义”进行的。

该组织还谴责了中情局在大学校园招募人员的行径，这种做法至今仍在继续，只是或多或少处于秘密状态。

《圣经》式的爱国主义。不惜一切代价 拯救布道

2023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
拒绝审查阿肯色州的一项法律，该法律要求所有政府承包商必须宣誓效忠以色列，这与2022年佐治亚州的法律类似，后者要求任何与该州有业务往来的大型承包商必须效忠以色列。

到2024年，全美50个州中有37个州出台了要求向外国——以色列——宣誓效忠的法规。

2023年底，正当以色列在加沙地带
对巴勒斯坦男女老幼进行大屠杀之际，美国南方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德国——

开始讨论一项法案，该法案要求申请入籍的候选人宣誓效忠同一个外国——以色列。

同年6月，德国规定，申请入籍者必须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却未提及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作为国家的任何生存权。
加沙战争

以及柏林对以色列的强力支持，在德国引发了诸多讨论。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宣称，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的“国家利益”。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后，世界上很少有地方像2023-

2024年巴勒斯坦大屠杀期间那样，出现过如此戏剧性的全球叙事共识破裂。这是一个超越任何观点的可验证事实。随着以色列将加沙化为灰烬，并践踏巴勒斯坦的任何权利或人道主义精神，全球主流媒体的主导叙事正逐渐崩解，最终演变为“反加沙”叙事。

作为 P =
 $d.t$ 这一公式的逻辑结果，以及面对那个看似不可阻挡的压倒性 d ，西方政府、霸权大国、日渐衰落的帝国（出于各种我们目前无法深入分析的原因）正争先恐后地对 t 发起猛烈攻势。

“自由世界”中的审查

所谓的“自由世界”——

这是历史上最成功、最广泛的宣传口号之一——指的是那些与自由民主国家结盟、却实行专制经济体制的国家，它们曾参与或成为数世纪帝国主义和奴隶制的一部分。矛盾的是，但这绝非偶然：这些国家过去和现在通常都是民主国家，它们在境内和境外都强制执行其法律。

正如我们在“奴隶制时代的言论自由”一章中所见，最有效且最广泛的审查并非通过禁止思想来实施，而是通过妖魔化。

当这种手段失效时，便会诉诸直接禁令，例如宗教裁判所，或是美国南部某些州（如佛罗里达州）的情况——

这些地区通过法律禁止数百本书籍、公立大学的课程，甚至在中学中对某些言谈方式或世界观进行限制。这一切都是以自由之名进行的。

但通常情况下，在自由民主国家，审查并不需要像在更传统的独裁政权中那样以直接而明显的方式实施。事实上，那种在上为异议留有空间的审查方式要有效得多，因为它更难被察觉和揭露。“既然你能这么说，怎么能说存在审查呢？”

“既然你能像在朝鲜那样批评独裁政权而不被关进

监狱，你怎么能说存在‘私有独裁’呢？”随后，他们便会用该体制通过其走狗和走卒们惯用的论调作结：“既然你这么批评这个体制，为什么不去朝鲜生活呢？”这仅仅是深层威权思维的冰山一角。

但真正的言论自由，并非取决于个人能否随心所欲地发言——

包括像球迷在看台中间高喊那些最宣泄情绪的辱骂——

而是取决于能否发表足以促使实际权力发生真正变革的言论。

如果我们在公开场合断言，世界上的实际权力掌握在跨国公司以及华尔街和伦敦的金融大鳄手中，那么在“自由世界”里，我们不会遇到任何问题——

直到这种断言对这种权力构成威胁为止。例如，当人们察觉到一种新的集体意识正在萌芽时。

那么，起初会出现那些唯命是从的媒体，通过所谓的“同等反驳权”来贬低批评者；随后，秘密机构便会动用那些不太合法的手段。最后也是

最不光彩的一步，就是将批评者投入监狱——

正如爱德华·斯诺登的遭遇——

或者让他“失踪”，正如许多人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卫星独裁政权中，乃至在“自由世界”内部所遭遇的那样。

这个被战略性地称为“自由世界”的地方，其审查制度并非基于禁止，而是基于将任何可能威胁到从中心辐射出的共识的叙事、信息或批评边缘化。我们这些异见者，是这一机制中非自愿的、而且很

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当边缘势力威胁到中心的稳定时，直接审查便会浮出水面——

例如佛罗里达州自2020年起通过的法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禁止了数百本书籍、课程和词汇，而这一切都是以所谓“受影响者”的自由之名进行的，即那些（中心主体）可能因他人的真相与苦难而感到不适的人。

中心之所以需要边缘的异议（在可容忍且可运作的范围内），有两个原因：其一，作为为其关于自由、民主以及对异见宽容的自鸣得意的叙事赋予合法性的手段；

二，将其作为随时可用的“对立面”资源——

也就是说，一旦边缘群体威胁到中心话语霸权的稳定性，中心便将其塑造成破坏自由与文明的魔鬼或威胁。

中心往往利用边缘的个体，将其提升为彰显中心优越性的范例：黑人因其他黑人奴隶不服从而鞭打他们；印第安人殴打自己的孩子，迫使他们尊重征服者的象征；心满意足的穷人批评其他饥肠辘辘的穷人，指责他们工作不够努力；

移民因某些差异（如合法身份）而攻击其他移民，因为他们必须是百分之二百的欧洲人或美国人，才能被视为百分之六十的欧洲人或美国人。

这种完美、系统化且去个性化的审查（如同资本主义中的绝大多数事物一样）同样产生了两种影响：要么多数人陷入恐慌，纷纷涌向由意识形态和

金融精英（通常是意识形态上的右翼）所掌控的权力中心；要么边缘群体中最突出的代表提出所谓的“中间派”

（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讲），而这些主张若在某次选举中取得成功，很快就会被权力中心（在西方即右翼）通过其雄厚的财力、主流媒体的宣传，以及诸如“新任叛逆执政者的责任感与务实精神”等神话——

这位执政者如今已被建制派驯服——而迅速收编。这通常是那些从政治（而非经济）边缘走向中心的领导人唯一的选择，以此避免在推行温和改革时遭遇挫败——

这些改革既要平息民众的挫败感，又要让真正的权力精英继续安坐于其堡垒之中。

为了不被赶下台或遭到抵制，这位“叛逆者”——

即使他代表了压倒性的绝大多数民众——

也必须与掌握经济、媒体乃至军事权力的那1%的人进行谈判。

正如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农场》（1945年）那篇从未发表的序言中所总结的：“英国文学审查制度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的。不受欢迎的思想可以被压制，不便的事实可以被掩盖，而无需官方的明令禁止。”

任何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知道，有些耸人听闻的新闻——

仅凭其本身的重要性就足以登上头条——

却被英国媒体所回避，这并非因为政府干预，而是

出于一种普遍看法，一种默契的共识，即某些事情
‘不宜’提及。
就报纸而言，这一点不难理解。英国新闻界高度集中，其中大部分归富商所有，而这些人完全有理由在真正重要的议题上不诚实。同样的隐性审查也存在于书籍和期刊中，以及戏剧、电影和广播中。”⁸

若非出于宣传，便是受法律所限

2024年5月1日，美国众议院

通过了《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Antisemitism Awareness*

Act）。之所以如此紧急，是因为数十所大学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加沙种族灭绝的示威活动。

自此，关于何为反犹太主义、何为非反犹太主义的任何公开或学术讨论，均被该法案一劳永逸地界定。该法案赋予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Miguel Car-dona）更大的权力，使其能够根据其“高标准”裁量，就何为反犹太主义以及“电车难题”的正确解决方案决定惩罚和制裁措施。任何讨论都将被限定在“自由世界领导者”国家的框架内，且“不得予以解释”（第6-a条）。

新法律的依据是1964年《民权法案》，该法案禁止基于种族或国籍对个人进行歧视——考虑到该法案正是由与大学校园中被谴责的抗议活动类似的运动所催生，这无疑是虚伪的极致体现。这些抗议活动是针对种族隔离、白人至上主义、帝国主义以及越南战争的坚定而勇敢的抗争。

当时，民权法案的倡导者们遭到攻击，并被诋毁为危险且好战之徒。

如今，除了要求结束巴勒斯坦大屠杀外，学生们最敏感的诉求之一，就是要求各大学撤回在强大军工产业中的金融投资，这呼应了美国学生当年反对另一种种族隔离——即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

他们的诉求在20世纪80年代、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及最近都产生了持续影响，最终促使布朗大学和罗格斯大学就撤资问题进行了实质性谈判。

尽管新法案试图采用普世化的措辞，却仅将一个受保护群体列为对象，以惩罚任何“针对犹太人”的言行。对以色列国或犹太复国主义的任何批评，如今（根据联邦法律）都被视为反犹太主义。

该法案确立了一个唯一且官方的哲学标准：“*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对反犹太主义的实践定义*”。该组织曾因将反犹太主义等同于对以色列国政策的任何批评，以及在反犹太主义与反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制造战略性混淆而屡遭批评。

直到昨天，其“*反犹太主义的实际定义*”尚无直接的法律后果。如今则不然。

根据该法案，“*反犹太主义在美国呈上升趋势，并从幼儿园起就影响着中小学及大学的犹太学生*”。这一点是正确的。但这一现象并非源于全球反殖民主义运动或左翼运动，而是源于极右翼新纳粹和新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的卷土重来——

这些团体已在政府中扩大了影响力，并且正如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一样，往往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以色列。只需看看美国、巴西、阿根廷、意大利、法国、乌克兰及其他国家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便知。

同样，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再次证明了它自1791年通过以来一直的本质：那是白人、富人以及帝国主义奴隶主的自由。当19世纪的反奴隶制者试图行使这一权利时，最终遭到了骚扰、迫害、监禁甚至私刑处决。

*“打击这种仇恨是一项国家优先事项，也是两党共同关注的议题，必须通过一种涵盖整个政府和社会各方的综合方法来成功实施。”*警察在校园里吐唾沫在巴勒斯坦国旗上，政客声称巴勒斯坦人应该从地球上消失，拉比宣称佛教徒或向耶稣下跪的人都应因偶像崇拜而死——这些都不是仇恨言论，也不是煽动暴力。对巴勒斯坦人事实上的、系统性的灭绝和骚扰并非仇恨言论，因为这根本算不上言论。

除了像所有殖民地一样在地下组织起来的民兵外，巴勒斯坦人没有自己的军队。如果他们使用武力进行自卫——

尽管常识和联合国都承认这是他们的权利——他们就是恐怖分子。此外，他们根本不存在。他们只是那些致力于“仇恨言论”之人的虚构产物。

正如内塔尼亚胡政府成员自己所言，巴勒斯坦人并不存在，而且他们是亚玛力人的后裔，因此根据三千年前上帝赐予现任国防部长本格维尔的命令，所有男子和儿童都应被灭绝。正如

戈尔达·梅厄所言：“我们无法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迫使我们杀害他们的孩子。”

但这既不是种族主义，也不是基于种族或宗教背景对某个群体的攻击。恰恰相反，该法律保护了美国政客和实施种族灭绝的以色列政府，使其免于因哈马斯而被指控抹杀加沙地带

数万名儿童及其他人的存在——

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被哈马斯绑架的人在任何以色列轰炸中都从未丧生。

该法律是立法创造力的杰作，它赋予特定人群豁免权，却将其他人排除在外。当局、记者和宗教人士无数次重复的、呼吁灭绝巴勒斯坦人的言论，均不被视为犯罪，因此也不受惩罚。

相反，这些言论如今反而受到免受任何批评的保护。无论是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法院，还是任何法律，都无权侵犯以色列那神圣而神圣的权利——

即以“先发制人”的自卫名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屠杀十万人。

几代人以来，对这一神圣权利的任何反应都被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加以打压。正如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吉拉德·埃尔丹前一天在联合国所言：“我们一直都知道哈马斯藏身于学校之中。但我们没意识到，他们也潜伏在哈佛、哥伦比亚以及许多顶尖大学里。”

不久之后，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大学校园里的“小加沙”。就像加沙

一样，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们遭到了警方和亲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暴力镇压。

正因如此，必须在那里予以惩处。新法律明确指出，其目的是“*扩大教育部长权力*”，以便其有权自由惩处那些不认同政府立场的人。2024年，最高法院也将采取类似举措，扩大总统的权力和豁免权——而总统正是任命教育部长及其他部长的人。该法案以这样一句话收尾，这句措辞恰似宗教人士解读神圣经文时所用：“*本法任何内容均不得予以解释。*”一个世纪前，在意大利，这被称为法西斯主义。

当有人对针对7万人大屠杀的抗议感到不满——其中超过半数儿童和妇女，几乎所有人（不公正地）都未持有武器——却对这7万人大屠杀本身毫不在意时，其本质便不言自明。

纳粹不仅关闭了他们认为腐朽的历史性建筑学派包豪斯，还因相对论的提出者是犹太人而将其宣布为伪理论，同时以“反德”为由禁绝了数千本书。如今，反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正不断接近那种同样的超现实主义。

从今往后，在“自由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我们将不得不变得更加诗意，并滥用隐喻——就像尼禄时代那样。当时，尼禄被以数字666（希伯来字母表中其名字的数值）代称，因为尽管当时存在一定的言论自由

，但一旦言论实质上动摇了当时的帝国权力，这种自由便会被禁止。

预测：若非靠法律，便靠炮火

继续观察公式 $P = \frac{P_a}{t_a} = \frac{P_b}{t_b}$ ，我们可以推断，在本世纪，由于 P_a 和 P_b （西北与东方）之间的反向平衡，我们将看到中国的 t 值增加，而西北或欧美地区的 t 值则逐渐减少

$$P_a/t_a = P_b/t_b \text{ 其中 } P_a < P_b \text{ 且 } t_a < t_b$$

当前的思想和地缘政治动荡促使霸权势力动用一切资源，依据公式 $P = \frac{P_a}{t_a} = \frac{P_b}{t_b}$ 通过以下三个主要层面采取行动：(1) 叙事层面，(2) 法律层面，(3) 军事层面。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留待本研究的后续扩展中探讨。

索引

- 阿道夫·希特勒, 77
阿吉, 91
奥尔布赖特, 146
德国, 82
艾伦·杜勒斯, 67, 68, 76, 80
阿连德, 90, 93, 101
黄色, 158
安德鲁·杰克逊, 58
盎格鲁-撒克逊人, 7, 18, 122
阿尔本斯, 66, 71, 73, 74, 78,
 79, 82, 83, 84, 85, 95
阿雷瓦洛, J.
 68、70、71、72、74
阿根廷, 80
阿桑奇, J. 36、104、105
阿斯图里亚斯, M. 88
雅典, 6, 119
奥斯汀, 19, 20
阿斯纳尔, J. M. 146
世界银行, 82
伯内斯, E.
 68、72、74、75、76、94
 、158、161
比尔·克林顿, 85, 146
黑水公司, 148, 149
博尔顿, 147
巴特勒, 55, 56, 57, 58
卡博特·洛奇, 67
加利福尼亚, 151
加拿大, 82
资本主义, 13, 17, 55, 84
卡洛斯·富恩特斯, 98
卡斯蒂略·阿马斯, 72, 83, 84
卡斯特罗, 32, 63, 109, 143
切, 32, 63, 143
切尼, 147
智利, 88, 93, 94, 101
中国, 9, 56, 95
丘奇, 87, 90, 91, 100, 148
中情局, 7, 33, 35, 62, 63, 65,
 67, 68, 72, 73, 76, 78, 80,
 81, 82, 83, 84, 87, 89, 90,
 91, 92, 93, 94, 96, 97, 98,
 99, 101, 117, 128, 140, 143,
 148, 149, 157, 158, 160, 161
文明, 14, 27, 49, 112
Club700, 73
殖民地, 8, 17, 29, 31, 33, 36,
 62, 104, 108, 142, 155
共产主义, 95, 97
邦联, 14, 27, 48, 108, 152
文化自由大会, 89, 97
反政府武装, 159
柯立芝, 76
哥斯达黎加, 98
古巴, 17, 30, 31, 32, 36, 56, 63,
 104, 141, 143
库亚梅尔水果公司, 67
大卫·梭罗, 11, 34
民主, 11, 14, 17, 24, 29, 30, 31,
 32, 35, 49, 62, 63, 116, 117,
 119, 124, 130, 141, 142,
 145, 146
民主国家, 13
民主派, 31, 141

独裁政权, 8, 9, 11, 13, 14, 15,

35, 49, 117, 130, 153

迭戈·里维拉, 88

上帝, 78

异见, 1, 2, 8, 17, 135

多样性, 1, 2, 23, 29, 135

唐纳德·特朗普, 147, 149

杜勒斯(兄弟) 66, 84

东印度公司, 13

中世纪, 131

爱德华·伯奈斯, 9, 34

爱德华兹, J. 93

艾森豪威尔, 65, 67, 72

《资本论》, 16

现代时代, 11, 35

奴隶主, 20, 151

奴隶制, 19, 20, 21, 69

奴隶, 25, 37, 48, 49, 105, 116

西班牙, 146, 158

美国, 8, 9, 10, 14, 15, 17, 28,

29, 30, 31, 32, 33, 36, 48,

49, 59, 62, 66, 70, 73, 74,

76, 78, 79, 83, 85, 86, 87,

90, 91, 92, 96, 97, 98, 104,

108, 109, 112, 115, 118,

121, 128, 132, 141, 142,

146, 147, 148, 151, 152,

153, 154, 155, 158, 160,

162, 163, 171, 173

尤金·德布斯, 10

假新闻, 157

联邦调查局, 82, 88, 124, 161

菲格雷斯, 98

佛罗里达, 72, 81, 84

法国, 17, 173

富兰克林·罗斯福, 57, 68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5

福山, F. 147

加布里埃尔·博里奇, 31, 141

加莱亚诺, E. 88

加西亚·马尔克斯, G.

88, 89, 98

加尔松, B. 153

加沙, 9, 105, 163, 164, 171,

175, 176

乔治·W·布什, 148, 153

戈培尔, 77

英国, 16, 17, 29

格兰特, 77

关塔那摩, 101

危地马拉, 32, 63, 65, 66, 67,

73, 75, 76, 78, 79, 80, 81,

82, 83, 85, 94, 96, 142, 143,

158

内战, 27, 49

冷战, 8, 35, 61, 148

海地, 56

亨利·福特, 69

希拉里·克林顿, 86

希特勒, 72, 84

好莱坞, 68

洪都拉斯, 67, 72, 82, 83

霍华德·亨特, 78, 89, 91

亨特, 89, 92, 94, 95, 96

帝国主义, 17, 30, 55, 88, 108,

128, 137, 172

印第安人, 85

英格兰, 146

宗教裁判所, 131

伊拉克, 147, 161

伊朗-尼加拉瓜事件, 102

以色列, 160

雅各布·阿尔本斯, 65, 70, 75,

76, 85, 94, 96

詹姆斯·波尔克, 58

耶稣, 5, 78, 130, 174

约翰·A·霍布森, 16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66, 67
朱利安·阿桑奇, 36, 104
正义, 14, 23, 117, 119
卡根, 147
卡洛, 88
卡尔·马克思, 15
肯尼迪, 33, 64, 143
基辛格, 100, 153
言论自由, 1, 2, 5, 8, 13, 14, 15,
17, 18, 23, 25, 26, 27, 29,
30, 31, 32, 33, 34, 36, 37,
62, 63, 104, 127, 128, 141,
142, 173, 177
自由市场, 13
林肯, 58
卢蒙巴, 79, 83
林登·约翰逊, 72
麦克阿瑟, 57
麦卡锡主义, 8, 35, 61
马克·吐温, 11, 34
马丁·路德·金, 88
中东, 101, 146, 147
墨西哥, 11, 19, 20, 21, 26, 27,
32, 34, 56, 63, 75, 80, 84,
88, 94, 95, 96, 116, 117,
143, 158
迈阿密, 149, 159
米勒, 88
嘲鸫, 92
莫内加尔, 98
摩根, 57
摩萨台, 65
墨索里尼, 59
穆斯林, 36, 104
纳粹, 85
黑人, 19, 20, 21, 69
聂鲁达, 第87、88、89页
尼加拉瓜, 56, 82, 152, 159
尼克松, R.
第73、85、90、91、100、
154页
美国国家安全局, 7, 90, 100
奥克塔维奥·帕斯, O. 98
美洲国家组织, 80, 92
奥利弗·诺斯, 102, 159, 160
“秃鹰行动”, 101
奥托·赖希, 158, 159
爱国者, 36, 104
保罗, 88, 147
罗马和平, 2
PBSuccess, 65
五角大楼, 158, 161
佩雷斯·希门尼斯, 80
菲利普斯, 94
霸权, 1, 2, 3, 17, 30, 61, 103,
141, 145
蓬佩奥, 153, 157, 161
新闻自由, 32, 63, 143
第一修正案, 9, 23, 33
先知, 6
优等民族, 77
多米尼加共和国, 56
共和党人, 31, 123, 141
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 99
罗廷格, 83, 84
罗恩·德桑蒂斯, 36, 103, 115,
122, 135
罗纳德里根, 73, 84, 158
拉姆斯菲尔德, 147
萨特, 88
《煽动叛乱法》, 9, 10, 33, 34,
35, 103
第二次世界大战, 8, 155, 164
杀手, 5
奴隶制, 14, 28, 123, 135
社会主义, 10

开放社会, 7
苏格拉底, 119, 131
索摩萨, 82, 83
标准石油, 56
斯托克韦尔, 83
台湾, 9
得克萨斯, 19, 20, 157
西奥多·罗斯福, 65
交通公司, 152
托洛茨基, 87, 88
杜鲁门, 82
图帕马罗斯, 99
乌克兰, 9, 173
苏联, 8, 79, 145
联合水果公司, 32, 62, 66, 67,
74, 75, 77, 84, 142
乌拉圭, 58, 80, 93, 95
瓦尔加斯, 98
巴尔加斯·略萨, 98
委内瑞拉, 153
韦拉克鲁斯, 19
维多利亚·伍德赫尔, 28
越南, 35, 62, 88, 91, 103, 172
弗吉尼亚·康佩, 13
华尔街, 55, 59, 67, 159
华盛顿, 11, 32, 36, 63, 104,
109, 117, 129, 138, 143,
147, 149
西印度公司, 13
威士忌, 75
威廉·洛伊德·加里森, 23, 185
沃尔福威茨, 147
泽穆雷, ·S. 67

初步笔记

¹ 马克思，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国新闻评论：选自〈纽约每日论坛报〉》。亨利·M·克里斯曼编，查尔斯·布利策作序。纽约：新美国图书馆，1966年。

² 霍布森，J.A.《帝国主义：一项研究》。伦敦：詹姆斯·尼斯贝特出版社，1902年，第60页。

³ 威廉·洛伊德·加里森的《解放者》。2015年9月11日。

⁴ 废奴主义者与言论自由。（2021年）。Mtsu.edu

⁵ 阿瓦隆计划。《美利坚联盟国宪法》；1861年3月11日。耶鲁大学。avalon.law.yale.edu/19th_century/csa_csa.asp

⁶

萨维奇，查理。《豁免权裁决加剧了总统权力长期扩张的势头》。《纽约时报》。（印刷版标题：“总统权力长期扩张中的突飞猛进”。）2024年7月3日，A版，第1页。

⁷ 坦诺，索菲。《德国要求新公民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CNN，2024年6月27日，
www.cnn.com/2024/06/27/europe/german-citizens-

israel-right-to-exist-intl/index.html。访问日期：
2024年7月5日。

8

“1945年，乔治·奥威尔为《动物农场》撰写了一篇序言。该序言未曾出版，直至今日仍不为人知”。《纽约时报》。1972年10月8日，第142页。